

案牘研究與田野調查： 日本東洋史學方法之一面向*

陳慈玉**

摘 要

本文從「研究方法」的層面著手，探討近代日本「東洋史學」的建構過程。首先選定白鳥庫吉及橘樸為日本「東洋史學」中兩大學派的代言人，其次把兩大代言人的問學風格作為線索，將他們的研究特色分別歸納為「案牘研究」（白鳥庫吉學派）與「田野調查」（橘樸學派）。再進一步以「案牘研究」與「田野調查」學派的人際脈絡為經，輔以「東洋史學」從萌芽到茁壯之間的時代背景為緯，分析兩人對時勢與東洋社會的看法。在勾勒出日本「東洋史學」的思想面貌之際，也刻劃了大時代的變遷，並凸顯出帝國主義對知識生產的影響。

關鍵詞：日本、東洋史學、白鳥庫吉、橘樸、帝國主義

* 本文初稿發表於「生活、知識與中國現代性國際學術研討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主辦，2002年11月21-23日），作者由衷地感謝吳文星教授的賜教。對許倬雲院士和狹間直樹、山田辰雄、熊秉真、張瑞德、黃自進、黃克武、李宇平等諸位教授的鼓勵，亦謹致謝忱。作者也誠摯地向《集刊》編委會和匿名審查人致謝。作者謹以此文紀念故東京大學名譽教授田中正俊先生。

收稿日期：2003年5月1日，通過刊登日期：2003年10月2日。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一、前言

日本的「東洋史學」學術領域大約在 1894 年至 1904 年之間萌芽，也就是中日甲午戰爭到日俄戰爭的十年間，當時適值日本開始侵略中國和朝鮮，所以此時代背景影響到日後日本東洋史學的方向，而它的成立則是結合了明治維新以前即已存在的「漢學」傳統，和維新以後自西方移入的做為「近代科學」之「歷史學」。¹

隨著日本對中國和朝鮮侵略行動的擴大，當時的學者逐漸注意到朝鮮、滿洲和中國的現狀，並欲探究其歷史、民族與文化，白鳥庫吉就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另一方面，新聞記者出身的橘樸，則在辛亥革命發生以後來到中國，他目睹中國政治環境演變下的民眾生活，並到農村從事田野調查工作，逐漸展開以民眾為主體的亞洲歷史研究。此二人之訓練不同，看法自異，但無疑地在日本東洋史學的建構上，都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

本文擬勾勒日本帝國主義之侵略亞洲與其東洋史學建構之間的關係。首先探究學院派的白鳥庫吉之貢獻；其次闡明非學院派的橘樸對中國史之理解；並試圖分析兩人對時勢與東洋社會的看法，以闡明帝國主義對知識生產的影響。

二、白鳥庫吉與日本的東洋史學

白鳥庫吉(1865-1942)是日本東洋史學的開拓者，他使日本的東洋史學能登上「世界的東洋學界」舞台，繼承他的學風而形成的白鳥史學，和內藤湖南²所倡導的內藤史學齊名，並對日本東洋史學都有決定性的影響力。³

¹ 中見立夫，〈日本の東洋史学黎明期における史料への探求〉，神田信夫先生古稀記念論集編纂委員会編，《清朝と東アジア》（東京：山川出版社，1992），頁 98。

² 內藤湖南（虎次郎，1866-1934），明治、大正、昭和期的東洋史學者。生於秋田縣，是南部藩的陪臣儒者內藤調一之次男，秋田師範學校畢業，1887 年到東京，從事《明教新誌》等編

(一) 史學訓練

白鳥於 1865 年 2 月出生在上總國長柄郡長谷村（現在的千葉縣茂原市長谷町）的農家，1879 年 3 月，進入縣立千葉中學校，當時的校長是慶應義塾大學畢業的那珂通世⁴（他同時兼任千葉師範學校和女子師範學校的校長）。但那珂在該年 11 月轉任東京師範學校訓導，而翌年 3 月，21 歲的三宅米吉到千葉中學校教授物理和化學，白鳥也跟隨三宅學習英文，那珂則注重日語文法，在這兩人的薰陶下，使白鳥對語言產生興趣。⁵

1882 年 7 月，白鳥以第一名的成績畢業，翌年 2 月進入第一高等學校，1887 年 9 月到帝國大學（東京大學）文科大學（文學院）⁶史學科（史學系）就讀，他是第一屆的學生。他之所以選擇史學科，大概是受到中學時代的老師三宅米吉的影響。三宅有志於史學研究，曾在 1886 年出版《日本史學提要》

輯工作，並學習英文。1894 年進入朝日新聞社，後成為《台灣日報》主筆、《萬朝報》記者。於 1899-1912 年間，前後訪問中國六次，與羅振玉、王國維等學者，以及熊希齡交往。1907 年成為京都大學講師，後升任教授，開創京都大學東洋史學派。1924 年到歐洲研究，並調查敦煌文書，1926 年被選為學士院會員，自京大退休。主要著作有《支那論》、《近世文學史論》、《日本文化史研究》、《支那繪畫史》、《支那史學史》等。以上見古川道雄，〈序說〉，內藤湖南研究会編，《內藤湖南の世界——アジア再生の思想》（名古屋：河合文化教育研究所，2001），頁 15-34；礪波護，〈內藤湖南〉，礪波護、藤井讓治編，《京大東洋学の百年》（京都：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2002），頁 61-98；三省堂編修所編，《コンサイス人名辭典 日本編》（東京：三省堂，1976），頁 790。

³ 五井直弘，《近代日本と東洋史学》（東京：青木書店，1976），頁 11。

⁴ 那珂通世(1851-1908)，明治時代的東洋史學者。盛岡（岩手縣）藩士藤村政德之子，藩儒那珂通高的養子。慶應義塾畢業，歷任東京女子師範校長、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教授兼第一高等學校、東大教授，研究日本、朝鮮和中國古代史。著有《支那通史》（漢文）五冊，並校訂出版《元史譯文證補》、《成吉思汗實錄》等。在日本史方面，則出版《外交釋史》（全四卷，1915）等。他極關心東洋史學的發展，於 1894 年首先在中學歷史教科書中使用「東洋史」的語彙。以上見三省堂編修所編，《コンサイス人名辭典 日本編》，頁 815。

⁵ 五井直弘，《近代日本と東洋史学》，頁 14。

⁶ 東京大學的名稱因時代而改變。大致而言，1877 年 4 月 12 日東京開成學校和東京醫學校合併成為東京大學，設有法、理、文和醫學四學部（學院）。1886 年 3 月改稱帝國大學，簡稱帝大，共有分科大學（現在的學院）和大學院（研究所）兩部份，分科大學有五個：法科、醫科、工科、文科和理科，另有東京大學預備門（第一高等學校）。到 1897 年，隨著京都帝國大學的設置，帝大又改名為東京帝國大學。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1947 年日本學制改為六、三、三、四制，廢除舊制高等學校，新制國立東京大學則於 1949 年誕生，第一高等學校成為教養學部。詳見中野実，《東京大学物語》（東京：吉川弘文館，1999），頁 8-27。作者感謝東京大學岸本美緒教授惠贈此書。

第一編，認為歷史是「探究社會文明進展之學」，而且主張觀察一國民之歷史時，必須尋求該國民與周遭民族及國家的關係，而將其視為世界史的一部份。⁷

當時白鳥剛就讀的史學科中，聘請德國史學家李斯（Ludwig Riess，1861-1928，Leopold van Ranke 的學生）講授史學，坪井九馬三⁸教地理學。所謂的史學係指西洋史，沒有日本史和東洋史的教學，到翌(1888)年才有國史（日本史）的科目。1889年6月，新開設國史學科，這是因為內閣臨時修史局（1869年設立）於1888年10月被廢止，而在帝國大學設置臨時編年史編纂掛（股），來承繼昔日以「正君臣名分之誼，明華夷內外之辨」為目的的修史局。⁹所以才聘請該局編輯長重野安繹、¹⁰編輯久米邦武、¹¹星野恒¹²為教

⁷ 五井直弘，《近代日本と東洋史学》，頁14-15。又，白鳥在第一高等學校就讀時，住在三宅位於傳通院所開的家塾，而三宅後來到高等師範學校任教，曾留學歐洲一年半。同前書，頁15。

⁸ 坪井九馬三(1858-1936)，明治、大正期的歷史學家，生於大阪，幼名久米吉。1872年進入開成學校，1874年就讀東京外國語學校，不久轉學東京大學文學部政治理財科；畢業後立即進入理學部，專攻應用化學，1885年畢業。在理學部就讀時，已於文學部教學。1887年留學德國、瑞士、奧地利等國，四年後得到文學博士回國，成為東大教授。1904年就任校長，1906年成為帝國學士院會員。1923年辭教授職，被聘任為名譽教授。其史學概論建立了日本史學方法的基礎，此外，他的研究領域有考古學、西洋史、歷史地理、東西交涉史和古代朝鮮史等。見三省堂編修所編，《コンサイス人名辭典 日本編》，頁737-738。

⁹ 五井直弘，《近代日本と東洋史学》，頁15-22。

¹⁰ 重野安繹(1827-1910)，幕末明治期的歷史學家、漢學家、文學博士、貴族院議員。生於薩摩藩（鹿兒島縣），在昌平黌學習考證學，歸藩後於藩校造士館教書。1863年薩英戰爭時負責談判事宜，明治維新後任職文部省，1886年擔任臨時修史局編纂長，主持《大日本編年史》的編輯，其學風是嚴謹的考證主義。1888年成為東大教授，設置東大國史科，創立史學會，與久米邦武、星野恒等人建構國史科的基礎。他亦擅長詩文，是明治時代屈指可數的漢學家，著有《大日本維新史》(1899)、《右大臣吉備公傳纂釋》(1902)、《國史綜覽稿》(1906)、《重野安繹史學論文集》(1938-1939)等。以上見三省堂編修所編，《コンサイス人名辭典 日本編》，頁537。

¹¹ 久米邦武(1839-1931)，明治時代的歷史學家。生於肥前藩（佐賀縣），在昌平黌學習，參與佐賀藩政改革，任教弘道館，當岩倉具視於1871年被派遣到歐美擔任特命全權大使，交涉條約改正時，他隨行出國，歸國後著作《米歐回覽實記》五冊。曾在修史局從事編年史之編纂，1888年成為東大教授，與重野安繹等人努力於把西方近代的歷史學方法移植到日本史研究領域。1891年發表論文〈神道是祭天之古俗〉（《史學會雜誌》23-25期），指出神道並非宗教，而是東洋祭天之一古俗；受到神道家和國家主義者的抨擊，被迫離開東大。這事件顯示出日本歷史的科學性研究與天皇制的衝突，象徵著學問的自由遭受到壓抑。此後，他在早稻田大學講課，也從事於大隈重信的《開國五十年史》之編纂工作，建構了日本古文書學的基礎。見三省堂編

授，開設國史學科。同時創立史學會，意欲參用西洋歷史研究的方法，依據往昔修史局所蒐集的材料，來考證或編纂日本史的事蹟，俾有益於國家。¹³

但是，白鳥在東大史學科就讀時，只聽過一堂重野有關史學方法的課，認為重野和當時日本的一般漢學家相異，重野並不輕視西洋進步的研究方法，要以古文書或同時代人的紀錄等基礎史料，來了解歷史真相。其史學精神是擺脫東洋而擁有西洋思想。¹⁴即使如此，當時史學科的西洋史教授只有李斯一位，白鳥在校三年所接受的西洋史課程，僅從歐洲古代到法國大革命時期。他自認為只修學了近代以前的西洋史概說就畢業了，但無疑地，他深受李斯的科學性、理性的方法論之潛移默化。¹⁵

白鳥於 1890 年 7 月畢業，8 月成為學習院的教授，兼歷史地理課課長。當時學習院是日本華族（貴族）所念的學校，教授有谷干城、鳥尾小彌太等將軍，和西村茂樹等國粹主義者。院長三浦梧樓正著手學制改革，在中等科六年、高等科三年的九年授課總時間中，以歷史的教學為最多，此點和文部省（教育部）所管轄的其他學校不同，這是因為學習院為華族學校，歷史是針對華族最適當的教學科目的緣故。¹⁶針對此種歷史課程在學習院中佔有最重要地位的現象，白鳥指出，因為當時歷史科和漢文科是兼具道德修身的功能，

修所編，《コンサイス人名辭典 日本編》，頁 409。

¹² 星野恒(1839-1919)，明治時代的歷史學家、漢學家，生於越後（新潟縣），自幼即好學，因家貧故，21 歲時到江戶（東京）擔任儒者鹽谷宕陰的學僕，歷時八年。1867 年，鹽谷過世後始回家鄉，在水原學校教書。1875 年再到東京，進入修史局，參與編纂《大日本編年史》，1888 年成為東大教授，講授國史學和漢學，盡全力充實史學科。他的漢學造詣極深，尤其對《春秋》、《左傳》非常精通，1906 年成為帝國學士院會員，1910 年擔任史學會評議會會長。代表作有《竹內式部事跡考》(1899)、《古文書類纂》(1901)、《史學叢書》(1909)等。見三省堂編修所編，《コンサイス人名辭典 日本編》，頁 1004。

¹³ 五井直弘，〈近代日本と東洋史学〉，頁 22。

¹⁴ 白鳥庫吉，〈史學界に對する重野博士の見識〉，《白鳥庫吉全集》，卷 10（東京：岩波書店，1971），頁 412-415。

¹⁵ 白鳥庫吉，〈學習院に於ける史學科の沿革〉，《白鳥庫吉全集》，卷 10，頁 379-380；Stefan Tanaka, *Japan's Orient: Rendering Pasts into Hist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p. 25.

¹⁶ 白鳥庫吉，〈學習院に於ける史學科の沿革〉，頁 380；五井直弘，〈近代日本と東洋史学〉，頁 30。

時人主張人格的修養非依賴歷史教授不可。¹⁷換言之，白鳥心中共存著以西洋思想爲主的史學研究法，和具倫理修身作用的傳統歷史學。

由於學習院注重歷史課程，所以在中學校六年中，有日本國史、「支那」史和西洋史（六年級）課程；在高等科時，除了西洋史以外，新設立了「東洋諸國史」課程。¹⁸其中，「支那」史由名漢學家市村瓊次郎¹⁹講授，他不喜歡教「東洋諸國史」，所以指定正規大學出身的白鳥負責西洋史和東洋諸國史。但白鳥在學生時代只修習西洋史，因此急急忙忙開始查閱地理上距離日本最近的朝鮮歷史，²⁰踏出了作爲東洋史研究者的第一步。

（二）案牘研究與史料蒐集

白鳥的朝鮮史研究也反映了中日甲午戰爭前夕日本的主要思潮。1885年，福澤諭吉²¹發表有名的〈脫亞論〉以來，不斷地爲文主張滅朝鮮是當然之趨勢，而陸羯南²²也認爲日朝清是唇齒關係，應結合以對抗歐洲諸國。在史學

17 白鳥庫吉，〈學習院に於ける史學科の沿革〉，頁 381。

18 白鳥庫吉，〈學習院に於ける史學科の沿革〉，頁 380-381。

19 市村瓊次郎(1864-1947)，大正、昭和期的東洋史學者，生於常陸（茨城縣）。1887年創設東洋學會，1889年和森鷗外共同創立新聲社，出版《支那史》第一卷，擅長考證學，1905年成爲東大教授，1907年得到東大文學博士。著有《支那史研究》(1939)和《東洋史統》全四卷(1939-1950)等書。以上見三省堂編修所編，《コンサイス人名辭典 日本編》，頁 108。

20 白鳥庫吉，〈學習院に於ける史學科の沿革〉，頁 381。又，十年後文部省才要各學校設置東洋史科目。

21 福澤諭吉(1835-1901)，明治時代的民間啓蒙思想家。他是豐前國中津藩士的五男，生於大阪，19歲遊學長崎，後隨緒方洪庵學習蘭學，1858年到江戶，1860-1867年間服務於幕府，轉學英學，三度隨幕府遣外使節到歐美視察。1868年創設慶應義塾，出版《西洋事情》(1866-1870)，介紹歐美文明。廢藩置縣後，他認爲明治政府是文明開化的推進者，以在野的立場來企求改變國民精神，其最大的課題是「一國獨立，富國強兵」，強調國權優先，1885年發表〈脫亞論〉，是侵略主義的先端，以大資本家的立場來構思帝國主義之道。以上見三省堂編修所編，《コンサイス人名辭典 日本編》，頁 946。

22 陸羯南(1857-1907)，明治時代的評論家。津輕（青森縣）藩士中田謙齋的次男，羯南是號，在藩校修習漢學與英學，1876年到東京，進入司法省法學校，但因與校長發生衝突而離校到北海道，後又回東京，到太政官書記局服務。1888年，當日本與列強的條約改正之際，由於反對歐化主義政策而辭官，創設《東京電報》，翌年新聞《日本》創刊，他爲社長兼主筆。此後，他不時發表有關內政、外交的社論，是當時輿論界的代表人物。其主要論點是對內企求國民之統一，對外尋求國家之獨立。以上見三省堂編修所編，《コンサイス人名辭典 日本編》，頁 393。

界方面，1890年代初期，東大史學科教授坪井九馬三開始講授朝鮮史，《史學會雜誌》也不斷出現有關朝鮮史的論文，這些論文並非以朝鮮史本身為對象，而是直接或間接地論及日朝關係。根據戰後傑出的朝鮮史學家旗田巍的說法，當時的朝鮮史研究大抵可分為儒學者系統和東洋史系統兩類，前者所捕捉的日朝關係，是以日本古典書籍為中心的「日朝同祖論」；後者則將視角置於中國古典書籍為主體的東亞，不但指出日本古書記載的錯誤之處，而且論證「日朝同祖論」的不成立，並進一步批判儒家經典，輕視中國文明，帶有侮蔑亞洲的想法，亦否定對朝鮮的親近感。²³可以說他們想脫離來自中國的傳統日本文化框架的牽制。

同時，東大教授井上哲次郎²⁴於1891年9月的史學會月例會中演講〈東洋史學之價值〉，主要認為：歐洲的東洋研究是幼稚的，尤其是有關中國、日本的部份。歷史為綜合性的學問，西洋人即使對東洋的動物或地質有所了解，但卻很難深究東洋的歷史學。因此研究東洋歷史是東洋人的義務，要把東洋歷史上的事實明白地顯示給西洋人，是日本人應做之事。並且東洋人在物理學等方面，是很難壓倒西洋學者，但在東洋史方面卻能迅速壓倒西歐的東洋學者。所以他主張應先研究歐洲史家的著作，講究其寫法，結合其進步的學問，再編纂東洋歷史，如此，當讓西方知曉東洋學者的成果時，東洋史一定能在歐洲成為非常重要且有益的專門學科。而在日本，則隨著國史的研究，能闡明國體，激發愛國心。²⁵

²³ 五井直弘，《近代日本と東洋史学》，頁32-33。

²⁴ 井上哲次郎(1855-1944)，明治、大正期的哲學家。生於福岡，少小在漢學塾讀書，後進入長崎廣運館，培養漢學知識。1883年發表〈倫理新說〉，並編纂日本最早的哲學辭典《哲學字彙》。1884-1890年留學德國，積極地將德國觀念論哲學引進日本，以樹立日本的觀念論哲學。他也嘗試以西洋哲學的方法，來解釋儒教為中心的東洋哲學，出版《日本陽明學派之哲學》、《日本古學派之哲學》以及《日本朱子學派之哲學》三部作品。1891年，應文部省之邀，著作國家所頒布的教育勅語之註釋書《勅語衍義》，此後一直論述如何實踐天皇制國家的國民道德。以上見三省堂編修所編，《コンサイス人名辭典 日本編》，頁125-126。

²⁵ 五井直弘，《近代日本と東洋史学》，頁39-40；Stefan Tanaka, *Japan's Orient: Rendering Pasts into History*, p. 62.

這番話大概使青年時代的白鳥湧起共鳴之感吧！因為他不但從 1894 年開始發表不少有關朝鮮史的論文，更於 1901 年留學歐洲前夕所寫的〈戎狄對漢民族之影響〉一文中，表示出如下的胸襟：

泰西學者著手研究東洋已歷百餘年，其間學者輩出，累積了各方面的鑽研之功，……這可謂為近代文運隆盛之因，我們東洋人宜對此西洋學者的偉大功勳表達謝意。但是退一步自我反省，東洋人研究東洋事是既便利且適當，卻反讓西洋學者執先鞭，東洋學的領土就有如政治界一般地被侵略蹂躪了，不勝憤慨。現在東洋諸國已老衰將亡，或許很難企盼這些國的學者振興此學，而我國相異於其他東洋諸國，社會萬般長足進步，就如同不允許他們侵入政治界和商業界一樣，在學術界應深入研究而自得。尤其在東洋學方面應該擁有凌駕他們以彌補其缺陷的抱負。……並非東洋學的全部都已被他們佔領，而無應開拓的領域與應研究的題目……現今佔據亞細亞北部的戎狄之研究就是其中之一科。²⁶

換言之，白鳥並不像福澤諭吉那樣，以為西洋文明是全能的，而是要與歐洲學者相競爭，主張日本人研究東洋學的必要性與有利性，此點與井上哲次郎共通，並且成為他終生不變的信念。

在這信念下，他的朝鮮史研究也開拓了特殊的領域。他把研究的對象限於古代史，其想法和所用的方法大致是：(1)根據中國的史籍來檢證朝鮮方面的史籍；(2)闡明朝鮮古傳說的由來；(3)主張古傳說並非史實本身，歷史上的英雄是後代人塑造的，是表彰當時思想的歷史紀念物；(4)他在比較考證朝鮮和中國史籍時，是利用朝鮮語等語言上的知識。這種方法當時的日本史家並未嘗試，而白鳥此後以朝鮮史為出發點，擴展到蒙古史、中亞古代史、日本和中國古傳說的研究等領域，都是採用這種方法，因此可以說「白鳥史學」

²⁶ 白鳥庫吉，〈戎狄が漢民族の上に及ぼした影響〉，《白鳥庫吉全集》，卷 8（東京：岩波書店，1970），頁 3-4。

的方法論已在此時期形成。再者，此方法的先決條件是做為衡量標準的中國史籍之正確性，白鳥認為中國正史編纂的正確精密是無庸置疑的。²⁷因此可以說，他的研究方法雖異於重視訓詁的漢學傳統，但依然忽略了民眾在歷史上所扮演的角色。

白鳥的擴大研究領域或與當時日本帝國勢力範圍的拓展有關。因為他的論文中，除了最早的〈檀君考〉是發表於甲午戰爭發生前夕的 1894 年 1 月外，其他的有關古朝鮮和塞外民族史（匈奴、契丹、突厥等）的論文都是甲午戰爭之後出現的。其研究方法，是以中國方面的資料來批判歐洲學者的研究成果，並且使用阿拉伯語、波斯語、土耳其語、希臘語和拉丁語來做為輔助工具。²⁸這種研究方法大致和他的朝鮮史研究類似。

白鳥的語言學和東洋史學訓練來自歐洲，1901 年春，學習院派遣白鳥到歐洲留學。他先到德國柏林大學和東洋學校，選修土耳其語和亞洲地理的課程，翌年 1 月轉到匈牙利布達佩斯，繼續土耳其語的學習外，並研究東洋諸民族的歷史，與當地東洋學者相交流。此後，到法、德、芬蘭和俄羅斯視察，於 1903 年 10 月歸國。²⁹

他在歐洲時，每到一個新地方，一定訪問書店和圖書館，盡量蒐集有關東洋的書籍，而他印象最深刻的是巴黎東洋學校的圖書館。因為該校只是外語教授學校的性質，但除了有關日本語、中國語、土耳其語和阿拉伯語等實用書類外，還收藏了不少朝鮮書籍。他認為，法國與朝鮮的關係遠不如日朝關係之深厚，卻擁有如此多的朝鮮書籍，而反觀日本國內，朝鮮書籍卻非常

²⁷ 五井直弘，《近代日本と東洋史学》，頁 44-45、158-159；中見立夫，〈日本の東洋史学黎明期における史料への探求〉，頁 115；Stefan Tanaka, *Japan's Orient: Rendering Pasts into History*, pp. 59-60；神田信夫，〈編集後記〉，白鳥庫吉，《白鳥庫吉全集》，卷 3（東京：岩波書店，1970），頁 1-4。又，白鳥庫吉，《白鳥庫吉全集》，卷 2（東京：岩波書店，1970），和卷 3 收錄他有關朝鮮史的研究論文和演講稿。

²⁸ 五井直弘，《近代日本と東洋史学》，頁 48-50。又，已去世的東大教授護雅夫認為，由於當時學問水準的制約，他往往把比較新的語言原封不動地適用於古代，這種比較語言的研究方式，難免發生錯誤。

²⁹ 五井直弘，《近代日本と東洋史学》，頁 51。

稀少，因此他下決心要蒐集朝鮮資料，以振興日本的朝鮮研究。³⁰

再者，他在留學期間感觸最深的是，歐洲學者不但研究東洋的風氣極盛，出版甚多的相關論文與書籍；很多學者更成立探險隊或學會，大家同心協力從事研究而提升業績。因此造成東洋人要研究東洋時，必須先知曉歐洲的東洋學者之研究成果，接受其引導的狀態。身為日本人的他，對此現象實在深感遺憾。所以在 1904-1905 年日俄開戰而日本勝利後，已經回國的他更加深了留學前的信念——東洋研究應當由東洋人率先進行。但是當時幾乎所有有關東洋的研究都被西洋人領先，所以日本人唯一能夠著手的領域就是成爲戰場的滿韓地區。³¹

白鳥在 1904 年 8 月出任東京帝國大學文科大學漢學科「支那」語學第三講座的助教授（相當於台灣的副教授），此後直到 1925 年退休爲止，他活躍於當時的東洋史學界。首先，他深受歐洲體驗的影響，開始著手組織學會，俾便於蒐集史料和研究亞洲問題。³²同時，東大的史學科已有所改變，如前所述，東大在 1889 年，除了專教西洋史的史學科外，新設立了國史學科，國史學科中開有「支那歷史及法制」的科目，漢學科的學生也可以修習「支那歷史」和「支那法制沿革」的課，而對國文（日文）學科的學生則開「支那歷史」的科目。到 1893 年，東大採取「講座」制度，共有二十個講座，其中並無東洋史或支那史的講座。要言之，當時講座是教授的研究工作分擔的組織，而科目則是對學生教學的組織。³³

數年後，漢學科分爲經、史、文三部，學生可以專攻「支那歷史」。教授群方面，1896-1904 年間，在中學時代啓蒙白鳥庫吉的那珂通世負責漢學「支那」

³⁰ 白鳥庫吉，〈訪書談——主として朝鮮本に關して〉，《白鳥庫吉全集》，卷 10，頁 114-116。

³¹ 白鳥庫吉，〈後藤伯の學問上の功績〉，《白鳥庫吉全集》，卷 10，頁 385-386。後藤伯是後藤新平伯爵：關於西方學者的訓練、成立學會，或形成非正式的學術網絡及其影響，Hans Hägerdal, "Why Sinologists Look East: An Essay on the Prosopography of Sinology," in Paul van der Velde and Alex Makay, eds., *New Developments in Asian Studies* (Leiden and Amsterdam: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Asian Studies, 1998), pp. 92-120 有很精闢的論述。

³² 中見立夫，〈日本の東洋史学黎明期における史料への探求〉，頁 116。

³³ 五井直弘，〈近代日本と東洋史学〉，頁 51。

語學第三講座，講授支那史、蒙古史和西域史；1896-1897年間，林泰輔³⁴以助教授資格教導支那哲學、漢文學和支那史。1898年以後，則由市村瓚次郎講授支那史。而史學科創設以來即任教的李斯於1902年回返德國，國史學科的重野安繹雖在1891年辭職，但1898年又成爲漢學「支那」語學第一講座的教授，他1901年退休後，星野恒繼任此職。³⁵

白鳥到東大的1904年，文科大學又進行改革，將漢學科分爲支那哲學科、支那史學科和支那文學科，換言之，支那史學科就此獨立。到1910年，隨著日本併吞朝鮮，支那史學科易名爲東洋史學科，而把歷史最久的史學科改稱西洋史學科。另一方面，講座的名稱也在1905年被修改，將漢學支那語學講座易名爲支那哲學支那史學支那文學講座，當時負責漢學支那語學第三講座的白鳥，則轉而擔當史學地理學第三講座。到1918年，又把支那哲學支那史學支那文學講座，分爲支那哲學支那文學講座和東洋史學講座；而史學地理學講座則分爲史學地理學、東洋史學、西洋史學三講座，所以共有兩個東洋史學講座。³⁶

隨著校內研究體制的建立，白鳥也嘗試組織亞細亞學會。由於他堅信研究滿洲和朝鮮歷史地理的必要性，如果學者各自採取孤立的態度，則成效不彰，因此希望有一學會能讓大家共同研究滿朝地區；但是東奔西走的結果，卻得不到實業家、政治家、教育家和學者的支持，所以此學會不太有活動。他覺察到組織學會來進行研究的困難後，乃改弦易張，決定集結少數的篤實

³⁴ 林泰輔(1854-1922)，明治時期的漢學家、史學家。千葉縣人，1886年東京大學古典講修科畢業，他先從事朝鮮史研究，後以考證學的方法研究經學，逐漸傾向古代史學，當劉鐵雲發現甲骨文時，他最先將之介紹給日本學界。擔任東大助教授後，於1908年轉任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教授。著述甚多，代表作有：《朝鮮史》(1892)、《朝鮮近世史》(1901)、《朝鮮通史》(1912)、《上代文字の研究》(1914)、《周公と其時代》(1916)等。1918年到河南安陽殷墟實地考察，蒐集甲骨等回日本，解讀研究後，於1921年出版《龜甲獸骨文字》，成爲日本甲骨文字學的先驅。他去世後，其門人井上哲之郎將遺著編成論文集《支那上代之研究》(東京：光風館，1927)。以上見下中邦彥編，《アジア歴史事典》，卷7(東京：平凡社，1961)，頁411；井上哲之郎，〈序〉，《支那上代之研究》，頁1-6。

³⁵ 五井直弘，《近代日本と東洋史学》，頁53。

³⁶ 五井直弘，《近代日本と東洋史学》，頁53-54。

學者設置一研究所。透過友人文部次官（教育部次長）澤柳政太郎的介紹，得到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以下簡稱滿鐵）總裁後藤新平的支持，1908年1月，在滿鐵東京支社內設置滿鮮歷史地理調查室（部）。³⁷此調查室（部）主任是白鳥，研究員中箭內互、³⁸松井等、³⁹稻葉岩吉⁴⁰負責滿洲方面，朝鮮方面的研究則由池內宏、⁴¹津田左右吉⁴²擔當。後來後藤新平離職，到1915年1

³⁷ 白鳥庫吉，〈滿鮮史研究の三十年〉，《白鳥庫吉全集》，卷10，頁404-405；〈後藤伯の學問上の功績〉，頁387。

³⁸ 箭內互(1875-1926)，日本東洋史學者，專長為蒙古史、元朝史。生於福島縣，1901年畢業於東京大學文科大學史學科，入研究所進修，專攻中國的基督教史。1907年，受聘為第一高等學校講師，講授東洋史，翌年進入滿鐵歷史地理調查部，1909年到遼東、遼西蒐集資料。1910年成爲一高教授，後轉任東京大學講師、副教授，1925年升任教授，曾在東京外國語學校和國學院大學兼課。他敬慕那珂通世，是其繼承人，1921年以〈元朝制度的研究〉得到文學博士。代表作爲《東洋讀史地圖》(1914)。他過世後，門人出版其論文集《蒙古史研究》(1930)。以上見下中邦彥編，《アジア歴史事典》，卷9（東京：平凡社，1962），頁80。

³⁹ 松井等(1877-1937)，東洋史學者。生於東京，1901年畢業於東京大學文科大學史學科，1904-1906年加入陸軍，參加日俄戰爭。1906-1908年在東大史料編纂課工作。此後任教於東京各大學和專門學校（國學院大學、早稻田大學、東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東京女子學校、東洋大學、日本大學、陸軍大學校、大正大學、東京高等師範學校等）。專長是滿洲史，尤其是對渤海史和契丹史的研究非常精闢。其名著《東洋史概說》(1930)打破日本傳統之說而立下新學風，可謂爲代表大正末、昭和初期的作品。以上見下中邦彥編，《アジア歴史事典》，卷8（東京：平凡社，1961），頁353-354。

⁴⁰ 稻葉岩吉(1876-1940)，東洋史學者，新潟縣人。1897年到東京，在一橋外語學校學習中文，1900年前前往華北遊學後，進入漢口的大阪商船株式會社支店工作，曾遊歷華中一帶。日俄戰爭時擔任軍中翻譯。他私淑內藤湖南，1908-1914年，進入滿鐵歷史地理調查部，參加《滿洲歷史地理》的編纂，並出版《清朝全史》(1914)、《滿洲發達史》(1915)。1915-1922年，在陸軍大學講授東洋史，在參謀本部教中國政治史。1922年末，成爲朝鮮總督府朝鮮史編纂會委員，1925年，朝鮮總督府朝鮮史編修會開設時，他被任爲修史官，編纂《朝鮮史》二十五卷。1936年得到文學博士，翌年退休後，轉任滿洲建國大學教授。其著作尚有《北方支那》、《朱舜水全集》、《支那帝政論》、《朝鮮文化史研究》、《光海君時代の滿鮮關係》等。以上見下中邦彥編，《アジア歴史事典》，卷1（東京：平凡社，1959），頁197；三省堂編修所編，《コンサイス人名辭典 日本編》，頁120-121。

⁴¹ 池內宏(1878-1952)，東洋史學者，專長爲滿鮮史。生於東京，幕末志士池內大學之孫，1904年畢業於東京大學文科大學史學科，1909年進入滿鐵歷史地理調查部，擔任朝鮮史研究。1913年成爲東大講師，1916年升任副教授，1925年升爲教授，1937年被推薦爲學士院會員。他以嚴密的考證學風建立了滿鮮史研究的基礎，主要著作有：《文祿慶長の役》正篇第1(1914)、別篇第1(1936)、《元寇の新研究》(1931)、《滿鮮史研究》上世篇第1(1951)、第2(1960)、中世篇第1(1933)、第2(1937)、近世篇(1972)等。以上見三省堂編修所編，《コンサイス人名辭典 日本編》，頁71；下中邦彥編，《アジア歴史事典》，卷1，頁163。

⁴² 津田左右吉(1873-1961)，大正、昭和期的歷史學者，生於岐阜縣，東京專門學校（早稻田大學前身）畢業後，成爲白鳥庫吉的門生，1908年參加滿鐵的歷史地理調查事業，後成爲早稻田

月，當時的總裁野村龍太郎、副總裁伊藤大八認為此歷史地理調查室（部）的性質，與滿鐵以營利為目的的宗旨不符合，所以將之廢止。但是滿鐵仍然補助些許費用，由白鳥等人於東京帝國大學內繼續研究，一直持續到 1937 年。其研究成果可以說很豐富，除了《滿洲歷史地理》二冊(1913)及其德文版、《朝鮮歷史地理》二冊(1913)問世外，更陸續出版《滿鮮地理歷史研究報告》15 冊，將日本人對滿朝地區的研究創見公諸於世。⁴³

史學研究的基礎是圖書史料，所以白鳥在 1906 年開始到朝鮮去試圖蒐集圖書，當時朝鮮沒有像樣的書店，他只買了 40-50 部，交由成田圖書館收藏。1908 年再度赴朝，此時情勢大變，他得以進入書店的倉庫，約花費 5,000-6,000 日圓購買了 5,000 冊左右的史料文獻和書籍（約 865 件），費用全部由滿鐵負擔，成為滿鮮歷史地理調查室（部）之寶。⁴⁴後來由滿鐵送給東京帝大，稱為「白山黑水文庫」，其內容包羅萬象，有歷史地理、經書類、經濟、法律、醫術和農業等各領域。其中朝鮮書共有 700 件，包括經部 12 件、史部 241 件、子部 113 件和集部 234 件。最值得注目的是，除了《李朝實錄》等所代表的正史外，更有《廣史》（10 集 200 冊）、《彙叢》（15 冊）、《說海》（59 冊）和《叢史》（50 冊）等「野史叢書」。由此可以了解到，當時白鳥的先見之明和用心良苦，可惜此「白山黑水文庫」大多燒燬於 1923 年的關東大地震。⁴⁵換言之，日本最早的、有系統的滿洲朝鮮史藏書，旦夕之間消逝於大自

大學教授。1913 年發表《神代史の新しい研究》，1914-1921 年出版《文學に現はれる我が國民思想の研究》全四卷，1924 年出版《神代史の研究》和《古書紀及日本書紀の新研究》，1930 年發表《日本上代史研究》。他的著作論證《古書紀》和《日本書紀》等神話，是後代人為了替天皇支配之正當性尋求根據而寫的，因此被認為冒瀆皇室尊嚴，故其著作在 1940 年成為禁書，他則在 1942 年以違反出版法而被禁錮三個月。戰後卻又得到文化勳章(1949)。關於中國史方面，著有《道教の思想と其の展開》、《左傳の思想史的研究》等。以上見三省堂編修所編，《コンサイス人名辭典 日本編》，頁 731-732。

⁴³ 白鳥庫吉，〈後藤伯の學問上の功績〉，頁 387-388；白鳥庫吉，〈滿鮮史研究の三十年〉，頁 405-406；五井直弘，〈近代日本と東洋史學〉，頁 68；中見立夫，〈日本の東洋史學黎明期における史料への探求〉，頁 116-118。

⁴⁴ 白鳥庫吉，〈訪書談——主として朝鮮本に關して〉，頁 116-118。

⁴⁵ 中見立夫，〈日本の東洋史學黎明期における史料への探求〉，頁 118-119。

然的災變中。

另一方面，白鳥並未忘懷組織學會以共同研究、促進東洋學之進步的理想。1907年2月，台灣協會⁴⁶爲了「裨補東洋一般之和平的文明，以圖善鄰與共存共榮」，改名東洋協會，由於他熱心奔走的結果，會長桂太郎⁴⁷同意在協會內設置學術調查部，合併亞細亞學會，使其會員成爲調查部員。此調查部最主要的事業就是出版學術雜誌《東洋學報》，以刊載有關東洋學的研究成果。開始時一年出版三期，後改爲季刊，得到歐洲東洋學者的重視，逐漸建構其權威地位。⁴⁸到1917年，三菱財閥領導人岩崎久彌，以35,000英鎊購買澳洲裔英國人莫理蓀（G. E. Morrison，泰晤士報記者，曾任中華民國大總統府政治顧問）的藏書，以此爲基礎，建立東洋文庫。白鳥負責組織研究部，所蒐集的文獻史料遠超過莫理蓀藏書，此後白鳥的主要活動是在東洋文庫。他以其研究業績和組織能力被稱爲「日本的東洋史學創始者」。⁴⁹

（三）時事關懷

白鳥生於波瀾萬千的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現實環境中，擁有建立東洋史學理想的同時，他也未曾忽略周遭的政治、外交情況，因此可以說，當時的政情演變激化了他對亞洲史的關懷。在日俄戰爭期間的1904年7月，他發表了〈有關我國強盛的歷史原因〉，指出日本先自中國和朝鮮引進文化，彌補本身原有的缺陷，後又吸收西洋文化，才能逐漸強盛。而中國之所以衰

⁴⁶ 台灣協會，1898年7月成立，會長桂太郎，其目的在協助開發台灣；後來爲了培養能從事台灣和華南地區公私營事業的人才，設置台灣協會學校，是現今拓植大學的前身。

⁴⁷ 桂太郎(1847-1913)，明治期的政治家、陸軍大將（上將）。生於山口縣，1863年成爲軍人，1870年到德國留學，研究兵制，1873年歸國，次年成爲陸軍步兵大尉（上尉），後逐漸升到陸軍次官(1886)，輔佐山縣有朋等改善軍政機關，努力確立近代性的軍隊。參加甲午戰爭後被封爲子爵，1896年任台灣總督、東京灣防禦總督，1898年成爲陸軍大臣，1901-1906年組織內閣，日俄戰爭結束後，他與西園寺公望輪流組閣，被稱爲「桂園時代」。他善於收攬人心，是官僚、政黨和資產階層之間的橋樑。以上見三省堂編修所編，《コンサイス人名辭典 日本編》，頁301。

⁴⁸ 白鳥庫吉，〈後藤伯の學問上の功績〉，頁389。

⁴⁹ 中見立夫，〈日本の東洋史学黎明期における史料への探求〉，頁119-220；高大鵬，〈漢學回家時：全漢昇教授談日本「東洋文庫」〉，《中國時報》，1980年8月22日，第8版。

頹是因爲抱持獨尊主義和保守主義，不接納西洋文物。但屢遭西洋人之屈辱和被日本打敗後，應可夢醒，若漢民族能追逐世界風潮，採用西洋文化，則可成爲不劣於俄國的強國。俄國此次雖戰敗，可是如果斯拉夫民族能因此圖強，擺平其他民族，亦可望成爲強國。中、俄兩國遲早必爭之地是滿洲，日本根本無法獨力防禦，所以最好設法使之變成中立地帶，如此才能斷絕日本的外患，確保日本在朝鮮半島之勢力。⁵⁰

他似乎很滿意自己的「滿洲中立地化論」，因爲翌年 1 月又以〈滿洲之過去及將來〉一文來補強。他認爲，亞洲的地理可分爲南北二大區域，其歷史也可分爲南北二大勢力（即北方憑藉腕力的騎馬民族和南方文化發達的農耕民族），他稱之爲亞細亞的雙元現象(dualism)。而在興安嶺以東至海的遼河與黑龍江兩流域即爲滿洲，一向居住著中國人和其他野蠻人。他們或走到漠北，或進入漢土，建立強大的國家，是東洋史上最奇怪之事。在滿洲的民族，有時遭受亞洲二大勢力之迫害，有時當二大勢力相爭鬥而疲弊不堪時，他們往往能趁機襲擊，在亞細亞建立強大勢力。但是十七世紀以來，世界局面漸變，進入十九世紀以後，英、俄兩國分別成爲南北兩方的大勢力，使往昔只在亞洲民族間所成立的雙元性形勢，變成必須依賴歐洲二強國的維持。而從前得以利用亞洲大陸的雙元性形勢來自由行動的，是居住於遼河與黑龍江流域的民族，現今則是日本國民擁有此好地位。所以日本應有如遼、蒙古或清朝，巧妙利用其地位，在亞洲建設大帝國那樣，於英、俄兩國對抗之際，謀求國家利益。並且日本實力尙不足以合併遼河及黑龍江流域，故日本未來應採取的大方針是設法維持亞洲大陸自古以來的雙元性形勢，永遠不要與大陸二大勢力的土壤相接觸。爲了達到此目的，就要趁戰勝之際，與清國和俄國談判，開放此二流域，以確保東洋的和平。⁵¹

隨著辛亥革命的發生和中華民國的建立，白鳥在 1912 年 6 月於《中央公

⁵⁰ 白鳥庫吉，〈我が國の強盛となりし史的原因に就て〉，《白鳥庫吉全集》，卷 9（東京：岩波書店，1971），頁 161-175。

⁵¹ 白鳥庫吉，〈滿洲の過去及び將來〉，《白鳥庫吉全集》，卷 8，頁 17-23。

論》上發表〈滿洲問題與支那之將來〉，仍然堅持他的看法。他認為辛亥革命是東亞的一大事，其未來走向與日本利害休戚與共。而革命本來的目的是爲了要建立近世國家，中國今後如果要具備軍艦、敷設鐵路、普及教育，以使國家強盛，而能與世界列強並肩齊驅，則不得不徵稅來增加財政收入。但中國民眾一向受儒教影響，認爲統治者向人民收稅是惡事，所以今後中國人必須覺醒。再者，他進一步指出，革命成功後，外國的壓迫會更多，或許將來蒙古、西藏和滿洲都會被奪取，中國能固守的只有十八行省，滿洲仍然是俄、英美法德和日本三大勢力對峙所在。⁵²就此意義而言，他主張關係著東亞和平與否的滿洲最好保持中立地帶的地位。

他的想法一直未變，將近二十年後，1931年夏天，他到成田山夏期大學講演〈滿鮮在東洋史上的地位〉，其中有關滿洲部份，他先敘述滿洲的歷史，指出當時滿洲存在著三股勢力，亦即俄羅斯和日本各擁有中東鐵路和南滿洲鐵道，而中國則持有土地主權，這是因爲長久以來三國都想佔領滿洲而妥協的結果。他進一步以歷史「知古鑑今」的功能，自認爲可以用政治家的立場，預測滿洲的未來，其論點是中國和俄羅斯領土都很大，而日本除了滿洲之外，並沒有其他發展的空間，如果放棄滿洲，則連日本的存在都很危險，所以他依然堅持唯有將滿洲作爲中立地帶(neutral zone)，才是三國妥協之道。⁵³

我們可以窺伺出此論點是跳躍性的思考，因爲既然認爲滿洲是日本的生命線，又如何要日本政府視滿洲爲中立地帶而不設法併吞呢？果然，在他演講之後不久，就發生了影響東洋史乃至世界史的一九一八事變，翌年「滿洲國」成立，日本實質上掌控了中國東北，白鳥的「滿洲中立地化論」終究淪爲夢想。

事實上，白鳥對當時中日關係的評論，是反映1920年代到1930年代初期日本東洋史學界對滿洲問題乃至中國問題的普遍看法，他的「滿洲中立地

⁵² 白鳥庫吉，〈滿洲問題と支那の將來〉，《白鳥庫吉全集》，卷10，頁146-158。

⁵³ 白鳥庫吉，〈東洋史上に於ける滿鮮の位置〉，《白鳥庫吉全集》，卷9，頁353-380。

化論」，與矢野仁一著名的「支那無國境論」、「支那非國家論」和「滿蒙藏並非支那本來的領土論」，⁵⁴有異曲同工之妙。或許也可以說，白鳥肯定了日本的併吞朝鮮和滿洲，乃至侵略中國，因為在他著名的〈有關我國強盛的歷史原因〉一文中，即透露出大和民族具有北方屬於阿爾泰民族的勇武性格和南方文物的精華，以及萬世一系的皇室，故異於當時衰頹的亞洲各民族，因此近年來學習西洋文物的日本有如東昇之旭日，逐漸強盛。再者，他認為亞洲歷史是北方憑藉腕力的騎馬民族和南方文化發達的農耕民族的對抗史，而北方民族常常得到勝利。但是由於北方民族的文化較南方民族低劣，所以往往被同化。此同化作用之間出現保守之風，固守舊陋，不僅中國如此，印度和波斯亦然，這就是亞洲衰敗的原因。⁵⁵換言之，白鳥的基本見解是南北對立論、萬世一系的大和民族論，以及進步的日本與停滯的亞洲論。立足於這些觀點，無疑地他肯定了日本的侵略行動。

三、橘樸與日本的中國史理解

橘樸(1881-1945)並非學院派的「中國通」，他對中國的理解可以說完全是經由獨自閱讀相關書籍和田野調查。他以新聞記者的敏銳感覺，獻身於中國研究，在波瀾的時代中尋求真正的中日友好之道，從而產生其獨特的中國史觀。

(一) 訓練與田野調查

橘樸於 1881 年出生於九州大分縣北海部郡白杵町，其父量(1859-1935)自官立大阪師範學校畢業後，曾歷任滋賀縣長濱講習學校訓導、三重縣師範

⁵⁴ 矢野仁一，〈支那無國境論〉、〈支那は國に非る論〉、〈滿蒙藏は支那本來の領土に非る論〉，收入氏著，《近代支那論》（京都：弘文堂書房，1923年初版，1924年再版），頁1-8、9-30、92-112；此三文原各刊載於《大阪朝日新聞》1921年12月25-26日、《外交時報》1922年4月15日和《外交時報》1922年1月。

⁵⁵ 白鳥庫吉，〈我が國の強盛となりし史的原因に就て〉，頁161-175。

學校助教諭兼舍監、沖繩縣師範學校訓導兼舍監、大分縣宇佐郡視學(督學)、愛知縣視學和島根縣松江市立高等女學校校長。他於 1905-1907 年被派遣到中國，擔任江蘇省鎮江八旗中學堂教習，兼鎮江府中學堂教習，後來回到故鄉經營大分市南豐學館。他在 1915 年到台灣，擔當總督府公立台中高等普通學校(1922 年改為台中第一中學)教諭一職。⁵⁶他可以說是典型的教育工作者，其足跡不但踏遍日本關西、九州、琉球一帶，並且遠渡重洋到中國和台灣。

橘樸是長男，1895 年在家鄉的高等小學校畢業後，即到東京，進入日本中學校，但因生病，所以轉入愛知縣立第二中學校。到三年級時，新任漢文老師為陽明學者，在其推薦下，閱讀《十八史略》和《史記·列傳》，受到英雄豪傑觀念的影響。他原本就不喜歡基督教，而英文老師強迫學生讀聖經，他乃向縣當局告狀，結果那位老師去職，他也被勒令無限期休學。由於父親是愛知縣督學，所以他插班轉入愛知縣第一中學校四年級，畢業後的翌年(1901)到九州熊本就讀第五高等學校。當時適值義和團事件餘波盪漾，熊本一帶瀰漫著中國熱，這或許是造成日後他邁進中國研究之道的遠因吧！但一年後，他又離開高等學校遠赴東京，並沒有進入大學，只是進出上野的帝國圖書館獨自學習，過了兩年半自由自在的時光。⁵⁷

1905 年是日本東洋史研究的關鍵年代，也是橘樸生涯上的關鍵年。他結束了「放浪」的日子，到北海道札幌的「北海タイムス社」(北海時報社)就職，工作之餘曾調查北海道的農村。一年多之後，隨著日本的實質佔據南滿，他於 1906 年 4 月進入東北大連的「遼東新報社」，擔任日本版的記者。他在這報社工作了七年多(到 1913 年 7 月)，不但應報社之要求，在大連、長春和哈爾濱等地採訪，並且盡量利用時間到農村調查中國民眾的社會經濟生活狀態。當辛亥革命發生時，他曾經以遼東新報記者的身分，到北京去求

⁵⁶ 山本秀夫，《橘樸》(東京：中央公論社，1977)，頁 7-12。

⁵⁷ 山本秀夫，《橘樸》，頁 13-22。

見段祺瑞(1864-1936)，並觀察政治外交動態，或許當時他已下定決心研究中國問題。⁵⁸

1913年7月，他終於到中國政治中心的北京長住，成為《日華公論》週刊的主筆，他一方面熱心觀察中國政局的演變，一方面研究民間通俗道教，此點相異於當時日本知識分子的經由儒教研究來了解中國。⁵⁹他認為中國思想上有二大潮流，儒教是立足於統治者的利益所組成的教義，而道教則是代表被統治者的思想和感情，從而代表大多數民眾的思想與感情。⁶⁰換言之，他延續往日農村調查的活動，用弱者（被統治者）的觀點來看中國歷史，逐漸形成他的方法論，那就是研究表面的政治現象之底層的社會組織與民眾生活。

另一方面，此時期的中國政治並不穩定，袁世凱的復辟事件導致二次革命，乃至形成軍閥政治。橘樸爲了了解軍閥政治下的財政及其對人民生活的影響，於是開始蒐集各省的地租、鹽稅等資料。他把調查結果和基礎資料都發表在《支那研究資料》（10冊）。⁶¹

其實，《支那研究資料》是不定期刊物，由「北京支那研究會」發行，1917年4月出版第1卷第1號，到1918年8月的第2卷第3號爲止，總共10號，每冊約300頁。主要內容除了前述各省的財政調查資料外，就是翻譯和注釋1916年末以來的〈民國行政統計彙報〉（國務院統計局編輯，在《政府公報》上連載），題名〈民國行政紀要〉；並記載政治、經濟的法令與規則等。其內容涵蓋財政、交通、司法、教育、農商各方面的沿革和現狀，以及蒙藏地區相關報導，更有當時住在北京或大連的日本人所寫的研究成果。其中，就某種意義而言，〈民國行政紀要〉可以說承繼《清國行政法》的內容，讓日本人能夠了解當時中國的行政制度。⁶²

⁵⁸ 山本秀夫，《橘樸》，頁21-29。

⁵⁹ 山本秀夫，《橘樸》，頁33-34；野村浩一，《近代日本の中国認識》（東京：研文出版，1981），頁211、220-223。

⁶⁰ 橘樸，《支那思想研究》（東京：日本評論社，1936），頁3。

⁶¹ 山本秀夫，《橘樸》，頁37。

⁶² 山本秀夫，《橘樸》，頁37-40；野村浩一，《近代日本の中国認識》，頁219-220。

《支那研究資料》的發刊，似乎得到當時內務大臣後藤新平（曾擔任臨時台灣舊慣調查會會長，提議編纂《清國行政法》）的支持與援助，其出版目的是有鑒於日本雖然出版不少有關中國的著書雜誌，但卻缺乏「真摯精緻」的研究，今後爲了中日兩國民的新結合，以及經濟的合作，意欲提供正確的中國相關知識給日本人。⁶³因此可以說橘樸要經由《支那研究資料》龐大的資料介紹，來透視中國的統治機構，以了解在此統治體制下的民眾世界。

《支那研究資料》只發行到 1918 年 8 月，就因爲橘樸本人的生病而中斷。此時恰巧日本政府出兵西伯利亞，所以橘樸結束了半學究的生活，以從軍記者的身分，經由大連、哈爾濱而抵達貝加爾湖(Lake Baikal)東的工業都市 Chita，在歸程中，曾經因腦溢血而臥病百日。回到北京後，他於 1919 年 3、4 月間開始和中野江漢⁶⁴一起編輯《京津日日新聞》，不久後發生五四運動，他雖然目睹事件的經過，卻直到 1925 年才在《月刊支那研究》上針對五四運動，有系統地發表評論。⁶⁵

橘樸在《京津日日新聞》時期，正值中國北洋軍閥混戰，他曾爲文尖銳地批判此種政治現象。當時他常出入都市的茶館和農村市集，因爲他認爲一般民眾在那裡所發表的言論代表某類「民意」與「輿論」。⁶⁶他於 1922 年 10、11 月之間，到山東李村（現在的嶗山縣）一帶從事農村的田野調查，並以朴庵的筆名，在《青島新報》（鬼頭玉汝於 1915 年 1 月創刊）上連載〈李村研

⁶³ 山本秀夫，《橘樸》，頁 37-39。

⁶⁴ 中野江漢(1889-1950)，生於福岡縣宗像郡，1903 年到東京苦學，1906 年擔任《九州日報》駐華特派員，翌年進入玄洋社。1916 年設立北京聯合通信社，1919-1923 年擔任《京津日日新聞》北京支局主任，並於 1922 年成立支那風物研究會，發行《支那風物》、《支那風物叢書》、《支那と滿蒙》等。1933 年，該會改稱爲支那滿蒙研究會，並出版《江漢雜誌》。他在 1933 年以後活躍於文壇和有聲媒體（收音機），1940 年成爲興亞醫學專門學校教授，1944 年擔任北京師範大學特別教授。著有《釋奠》、《通俗道教》、《支那人の天命觀》、《支那人の國民性》等。以上見中野江漢，〈朴庵兄と私〉，收入山本秀夫編，《甦る橘樸》（東京：龍溪書舍，1981），頁 69 的作者簡介（長男中野達執筆）。朴庵是橘樸的筆名。

⁶⁵ 山本秀夫，《橘樸》，頁 41-50。1919-1924 年，橘樸主要擔任《京津日日新聞》的主筆(1919.3-1920.6; 1922.4-1923.5)和《濟南日報》的主筆(1920.7-1922.3)，以及東方通信社的濟南通信員。

⁶⁶ 里見甫，〈天津時代の朴庵さん〉，收入山本秀夫編，《甦る橘樸》，頁 89-90。

究〉（10月16日-11月上旬）。李村一帶共有十三個村落，李村是其中心市鎮，在滄口東邊一里多，今為嶗山縣政府所在地；德國佔領時期稱為李村政區，日本佔據後在此設置軍政署。橘樸當時為了綿密地推斷中國農民的經濟生活，而到這一帶進行基礎的資料蒐集工作，此研究可以說是日後滿鐵農村實態調查報告的先驅。⁶⁷

再者，此時期也是中國新文化運動和思想革命澎湃的時期，橘樸透過清水安三⁶⁸的介紹和翻譯，前後訪問了陳獨秀(1879-1942)、李大釗(1889-1927)、蔡元培(1868-1940)、胡適(1891-1961)、辜鴻銘(1854-1928)、魯迅(1881-1936)和周作人(1885-1966)等人，⁶⁹或許多少影響他傾向自由主義的思想。

（二）方法論形成

橘樸於1923年6月自天津到旅順，翌年開始編輯《月刊支那研究》。《月刊支那研究》是橘樸繼《支那研究資料》之後，所主編的第二種雜誌，此期刊由大連的「支那研究會」發行，該研究會並且在東京設置有支部，企盼能對日本國內知識界發生作用。此點相異於僅在中國流通的「北京支那研究會」所發行的《支那研究資料》。但是兩期刊的命運卻相似，因為《月刊支那研究》在1924年12月1日出版創刊號後，到翌年9月1日的總第10號就結束了。⁷⁰換言之，兩者都是只出版了10期，不到一年的時間即宣告中止。

這種情形應與當時橘樸所處的文化環境有關。當時在華的日本人之間，

⁶⁷ 山本秀夫，《橘樸》，頁58-60。

⁶⁸ 清水安三(1891-1988)，生於滋賀縣高島郡，京都同志社大學畢業，曾留學美國，1917年到中國奉天，經營供中日韓俄小孩遊玩的兒童樂園。1919年，利用得自日本教育會的基金，參加華北旱災救援工作，除了分配棉布到平漢、津浦鐵路沿線的村莊外，並且在北京東便門外借用倉庫，設置災童收容所，共救濟799名兒童，因此得到勳五等嘉禾章。1920年，於北京朝陽門外，創立崇貞女子工讀學校，教育貧民子女，直到戰爭結束（此校現為朝陽中學）。1946年回日，翌年5月在東京都町田市創建櫻美林學園，直至今日，該學園包括幼稚園、小學、初中、高中、短期大學和一般四年制大學。以上見清水安三，〈橘樸先生の思い出〉，收入山本秀夫編，《甦る橘樸》，頁79的作者自我簡介。

⁶⁹ 清水安三，〈橘樸先生の思い出〉，頁80-83。

⁷⁰ 山本秀夫，《橘樸》，頁85-86。

主要發行有六種期刊：《調查時報》（大連，滿鐵發行，1919年12月創刊）、《支那研究》（上海，東亞同文書院發行，1920年8月創刊）、《滿蒙》（大連，滿蒙文化協會發行，1920年創刊）、《新天地》（大連，新天地社發行，1921年6月創刊）、《北京滿鐵月報》（北京，滿鐵北京公所發行，1924年5月創刊）和《月刊支那研究》（大連，支那研究會發行，1924年12月創刊）。此六種期刊都是五四運動發生以後出現的，並且大部份是滿鐵、東亞同文書院和社團法人所出版，只有《月刊支那研究》純賴個人的財力支持，⁷¹當然不敵滿鐵等的集團力量。

再者，就橘樸而言，他大可投稿於這些期刊（其實，《月刊支那研究》停刊以後，他就是如此），而不必大費周章地辦雜誌，那麼，究竟是什麼動機促使他主編和發行期刊呢？最可能的因素是，置身於動盪不已的中國政治環境下，他極希望盡可能迅速而有系統地把所觀察到的中國真面貌介紹給日本朝野。⁷²因為他認為中日之間的關係，就彷彿法國人了解英國、英國熟諳德國那樣，了解中國應該是日本國民日常生活必備的常識。但是日本的「支那知識」是非常貧乏的，並且幾乎從根本就錯誤。例如，日本人自以為比中國人先進，日本人一方面堅信中國是儒教立國，另一方面卻又認為中國是欠缺道德情操的民族。所以橘樸意欲把科學的方法（利用人種學、心理學及其他社會科學）灌注到日本傳統的「支那研究」學風之中，進而逐漸發展出相異於傳統日本的「支那學」，也超越歐美學者的方法論，開拓世界「支那研究」的新領域。⁷³

具體而言，橘樸在《月刊支那研究》的論著大致可分為四部份：中國革命史論、評釋《官場現形記》、中國民族性研究、中國民族的宗教與道德研

⁷¹ 山本秀夫，《橘樸》，頁88-89。

⁷² 山本秀夫，《橘樸》，頁90。

⁷³ 大上未廣，〈編輯者後記〉，橘樸，《支那社會研究》（東京：日本評論社，1936年初版，1939年4版），頁1-13；山本秀夫，《橘樸》，頁92-93。

究。⁷⁴他認為有四大勢力保證著中國社會之安寧：行會、家族制度、面子意識和道教勸善懲惡的教理，此四大勢力如果能在被統治階級之間運行順暢，則社會得以安寧；但統治階級不但不能充分保證社會安寧，甚且擁有名譽、權勢與私欲等強烈衝動，所以導致爭亂重複不已。⁷⁵在此四大勢力之中，後兩者規範了置身於中國社會民眾的生活方式，而從此生活意識中所產生的前兩者，構成了中國社會結構的基礎。他指出，中國社會中最重要的組織是家族（宗族）與行會。源於血緣的家族形成宗族，幾個宗族互相結合成為村落共同體；此社會組織另一個紐帶即為行會。而在這社會二大組織之上，就是從宋朝以來歷經一千多年所形成的官僚階級。他認為這種組織型態的中國社會不是封建社會，亦非亞細亞生產模式的社會，更不是資本主義社會，而是官僚的前資本主義社會，在此種社會生活所醞釀出的民族性為保守性、消極性、柔順性和雷同性。⁷⁶

橘樸論證其觀點的主要依據是長年研究的「通俗道教」和《官場現形記》，在這過程中，他發現應該否定自我中心主義，要站在中國民族的立場，從內部了解中國。換言之，他認為西歐人以其社會的標準來衡量亞洲人，日本人也常常以西歐的標準來衡量中國人，這都是自我中心主義。因此他確信，如果不能擺脫對本身所屬社會的道德標準的普遍妥當性之迷信，則無法得到正確的結論。這可能是他渡華八年，從事道教研究，也到華北農村接觸農民生活後所得到的體驗，此種以「中國人的尺度來衡量中國」的立場是他此後一貫的原則，也成為他研究中國的方法論之基礎。⁷⁷

在這方法架構下，橘樸展開了對京都大學東洋史學開創者內藤湖南的《新支那論》之批判。內藤於辛亥革命後不久的1914年出版《支那論》，認為當時中國時局有如走馬燈般急轉變化，中國統治的訣竅是「父老收攬」，因為

⁷⁴ 山本秀夫，《橘樸》，頁90-91。

⁷⁵ 橘樸，《支那思想研究》，頁52-53。

⁷⁶ 橘樸，《支那民族性に關する考察》，《支那思想研究》，頁223-351。

⁷⁷ 山本秀夫，《橘樸》，頁96-97。

父老是鄉黨宗族的代表，革命黨在辛亥革命中之未能完全成功，就是因為無法收攬父老的緣故。這些父老對於外國人並不特別擁有獨立心或愛國心，他們只要故鄉安全、宗族繁榮、每天快樂地過日子（所謂「安居樂業」），在任何國家、人士的統治下都能柔順地服從。因此，中國將來即使出現都統政治（義和團事件時，在天津設置都統衙門，諸國聯合管理），⁷⁸對中國民眾而言，就是最幸福的境界。⁷⁹換言之，他並不理解孫中山等革命人士的「革命救國論」。

十年之後，針對當時強烈的排日運動，內藤湖南又發表《新支那論》，強調先進國日本在中國的經濟活動可使中國社會活躍。⁸⁰因為中國古老的經濟組織，完全相異於先進工業國的經濟組織，很難適用於革新，故採用與中國情況相類似的日本經驗為最佳之道，內藤從而主張改革中國經濟組織是日本人的使命。他之所以對中國新工業發達的可能性抱持悲觀看法，乃是因為中國的社會組織以家族鄉團為本位，財產繼承制度又是採取均分制，即使是一家族的資本，也很難成為集中的組織。而在商業上，由於是「鄉團組織」，即使能合夥經營，也很難組織股份公司；於是大資本不可能集中，中國新工業的發展當然無望。⁸¹

針對內藤的中國新工業悲觀論的源由是家族制度的看法，橘樸固然肯定家族是構成中國社會的基礎，但他也指出事實上當時已出現了突破家族制度之拘束的股份公司，其規模年年增大，經營業績良好。換言之，內藤所說的舊的、基於人情關係的經濟組織，並不具有絕對的限制，而是流動性的。⁸²這可能是橘樸長期居留於中國，經常以敏銳的觸角觀察中國現實動態所產生的

⁷⁸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事日誌》，冊2（清季）（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3），頁1106。

⁷⁹ 內藤湖南在《支那論》中的自序，轉引自山本秀夫，《橘樸》，頁99。

⁸⁰ 古川道雄，〈序說〉，頁17。

⁸¹ 橘樸，〈支那はどうなるか——內藤虎次郎氏の新支那論を読む〉，《支那思想研究》，頁370-371。

⁸² 橘樸，〈支那はどうなるか——內藤虎次郎氏の新支那論を読む〉，頁372。

判斷，當然相異於遠在京都象牙塔中「東洋學者」的看法，但卻更逼真、更接近現實的中國。⁸³

（三）時勢評論與田野調查

嚴格而言，橘樸對內藤的批判是基於 1920 年代動盪的中國現狀，而且他當時急速吸收馬克斯主義理論，所以他在 1920 年代後期詳細分析中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他所說的中產階級是相對於官僚階級和鄉紳階層，為廣泛的、被統治的民眾（農、商）。而他期待二十世紀中國的未來，是由中產階級的自治組織——村落自治體和行會（包括公所、會館和商會）——來管理，換言之，以往政治上被壓抑的中產階級，為了自衛，要打倒腐敗混亂的官僚階級而代之，建立新的近代國家。相對於內藤湖南所主張的中國歷史是政客與鄉團自治組織相對抗的看法，橘樸認為，中國歷史是統治者的官僚階級與被統治者之一的中產階級之間，有意識或無意識的階級鬥爭史，此階級鬥爭成為他的「全中國觀的骨子」。⁸⁴在這種關懷之下，他屏息靜觀上海的五卅慘案和國民革命軍的北伐過程。

橘樸在 1926 年 9 月停止發行《月刊支那研究》，10 月轉任滿鐵調查課⁸⁵的囑託（特約人員）。滿鐵調查課從 1919 年開始發行《調查時報》，到 1927 年第 7 卷改題為《滿鐵調查月報》，刊載有關中國和蘇俄的社會經濟調查與資料文獻等，期望能增進日本政界和學界對中國的了解。⁸⁶橘樸在《調查時

⁸³ 此外，橘樸對內藤有關中國政治前途的看法，亦有所批判。橘樸，〈支那はどうか——內藤虎次郎氏の新支那論を読む〉，頁 360-408。

⁸⁴ 橘樸，〈支那はどうか——內藤虎次郎氏の新支那論を読む〉，頁 388；野村浩一，〈近代日本の中国認識〉，頁 238-239。

⁸⁵ 調查事業是滿鐵首任總裁後藤新平所標榜「文裝的武備」論的重要一環，也是為了能有效推展殖民政策所採取的一種手段。滿鐵調查課的前身是調查部，調查部創設於 1907 年 4 月，翌年 12 月改稱調查課，1932 年 1 月又被整編成為經濟調查會，其後再三改稱大調查部（1938 年 4 月）與調查局（1943 年 5 月），每一階段的調查重點雖因時局轉移而有所不同，但原則上是在配合日本國策。詳見黃福慶，〈滿鐵調查部的調查事業——「滿洲舊慣調查報告」評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19（1990 年 6 月），頁 341-345；小林英夫，〈近代日本と満鉄〉（東京：吉川弘文館，2000），頁 13-14。

⁸⁶ 五井直弘，〈近代日本と東洋史学〉，頁 164。

報》、《滿鐵調查月報》和《新天地》等雜誌上，為文批判日本對當時中國（尤其是滿洲）的政策，也介紹他對滿洲農村的田野調查成果，更發表有關中國勞工運動的研究。⁸⁷

當時《滿鐵調查月報》特別注意中國的時勢推移，並訪談革命陣營內的關係人士，以上海為中心，正確地報導國民革命檯面下的動態，以及革命陣營內部左右對立的歸趨。橘樸根據這些調查報告寫成《中國革命史論》。⁸⁸我們無法在此詳細解讀他的著作，只想說明的是，他仍然沿用前述的方法論，認為中國未來要以民眾本身的手來形成具有近代意義的國家，而這種「國家意識之覺醒」是「歷史進化」的過程之一。國民革命內蘊了此歷史意義，是無法抹殺的。但是，中國高昂的民族主義，一定會與日本在滿洲的特殊權益相衝突。基於這種認識，他呼籲日本要把在滿洲的權益只侷限於純經濟方面，不但必須放棄政治軍事野心，甚至不應該移民到滿洲，並且要撤回領事裁判權。⁸⁹再者，他認為當時在滿洲的日本人忽視了滿洲的普遍性，而只強調其特殊性，不把滿洲問題當做中國問題的一部份來認識。如果日本人以滿洲為軍事利用的目標，則必陷於不可自拔之困境。因為日本在滿洲的軍事政治權利，即使直接關係著日本的生存權，也與中國的國權無法兩立，而在純經濟權利方面，則可與中國的利益相輔相成。⁹⁰

⁸⁷ 山本秀夫，《橘樸》，頁 127-142。

⁸⁸ 坂野良吉，〈中國政治をめぐる情報の質と政策決定の間——田中義一、蔣介石「會談」を例として〉，《戰前期中国實態調査資料の總合的研究》（東京：文部省研究成果報告書，1998），頁 93。關於橘樸此時期(1926-1931)對中國革命、勞工運動、共產黨的論文，戰後再版成《中國革命史論》（東京：日本評論社，1950）。其內容介紹和相關研究可參考：花村芳樹，〈書評《中國革命史論》〉，《東洋文化》，號 4（1950 年 7 月），頁 111-115；山田辰雄，〈橘樸の中國国民革命論〉，收入山本秀夫編，《橘樸と中国》（東京：勁草書房，1990），頁 64-114；山田辰雄，〈橘樸と中国国民革命〉，收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第三屆近百年中日關係研討會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冊上，頁 417-454；野村浩一，〈近代日本の中国認識〉，頁 243-256；山本秀夫，《橘樸》，頁 128-165。

⁸⁹ 橘樸，〈支那批判の新基調〉，《讀書會雜誌》（滿鐵，1926 年 11 月）；轉引自野村浩一，〈近代日本の中国認識〉，頁 259-261；山本秀夫，《橘樸》，頁 183-184。

⁹⁰ 橘樸，〈在滿邦人の支那及滿洲論策批判〉，《滿蒙》（1927 年 6 月）；轉引自野村浩一，〈近代日本の中国認識〉，頁 261-262；山本秀夫，《橘樸》，頁 187-188。

他的見解是在滿鐵所發行的雜誌上刊載的，滿鐵以日本的「英國東印度公司」自居，其目的是爲了殖民地經營，而從事田野調查的調查課僅爲其中的一個小組織，卻直到 1940 年代初期都有如此自由、科學的氣氛，其原因可能是首任總裁後藤新平當初設置調查部的構想與企圖，以及調查部成員的想法。因爲在急速變化的中國情勢中展開調查工作，非抱持自由且科學的態度不可。⁹¹相較於坐在研究室或書齋中研讀文獻而發表時論的白鳥庫吉，當然是天壤之別。

即使如此，九一八事變以後的橋樸也「轉換方向」了，肯定石原莞爾⁹²對滿洲的政策。⁹³當時他擔任《滿洲評論》週刊的主編，《滿洲評論》是他繼《支那研究資料》、《月刊支那研究》之後第三種主編的雜誌，於 1931 年 8 月 15 日發行創刊號（32 頁，共 5,000 部）以來，一直持續到 1945 年日本戰敗前的 7 月爲止，幾乎與東北的十五年戰爭期間相同，這與前兩種期刊的短暫命運相異。主要是因爲當時橋樸不但針對時局，以嚴正的批判精神，提出積極的主體性展望；而且以橋樸爲中心，還有幾位年輕人加入編輯和寫作的行列，加上發行人小山貞知（滿鐵總務部囑託）在財政上的圓滑運作，使該週刊能維持十多年的歲月，並形成以橋樸爲精神領袖的《滿洲評論》派。⁹⁴

《滿洲評論》的發刊是在中村大尉事件（6 月 27 日）、萬寶山事件（7 月 2 日）等中日關係緊張時刻，目的是要對中國情勢提出科學且公正的批判

⁹¹ 五井直弘，《近代日本と東洋史学》，頁 167。

⁹² 石原莞爾(1889-1949)，昭和期的陸軍中將。生於山形縣，陸軍大學畢業，1928 年曾任關東軍參謀，爲了解決日本經濟恐慌問題，所以計畫武力佔領滿洲，主導九一八事變和成立「滿洲國」。1937 年 9 月，升爲關東軍參謀副長，主張不擴大中日戰爭，與東條英機內閣對立，乃被排斥於核心之外。後曾經到京都立命館大學擔任教授，倡導東亞聯盟運動。以上見三省堂編修所編，《コンサイス人名辭典 日本編》，頁 91。

⁹³ 關於他的轉變方向，一向是日本學者研究橋樸的重點所在，除了前引山田辰雄，〈橋樸の中国国民革命論〉和〈橋樸と中国国民革命〉外，還有浜口裕子，〈橋樸と石原莞爾——滿洲事變前後を中心に〉，《軍事史学》，號 94（1988 年 6 月），頁 19-33，和〈橋樸と石原莞爾——「東洋民族解放論」と「東亞連盟論」〉，收入山本秀夫編，《橋樸と中国》，頁 189-238；小股憲明，〈橋樸の社会思想と変革論〉，《人文學報》，號 52(1982)，頁 1-50。

⁹⁴ 山本秀夫，《橋樸》，頁 209-216。

與評論，也要蒐集研判中國與滿洲之趨勢時所必須的內外文獻資料，所以在中國各地（南京、上海、北平、天津、廣東、奉天、哈爾濱）以及東京、大阪、紐約，都擁有通訊網，以期能提供世界對中國和滿洲問題的正確知識。⁹⁵發行人小山貞知當時兼任滿洲青年聯盟的理事，也是滿鐵和關東軍的囑託，與關東軍的上層軍人深交。而滿洲青年聯盟成立於 1928 年 11 月，主要目的是呼應關東軍，要以日本人的手來奪取被視為日本生命線的滿洲。⁹⁶

因此，《滿洲評論》的性格很奇妙，連魯迅都覺得不能了解。這可能是小山貞知的方針，他除了自己為文或有時帶來關東軍參謀及其他右翼的論文外，其他一切編輯事宜都委諸橘樸，即使橘樸日後辭去主編之職，尊敬他的「門人」仍然刊載自由主義乃至馬克斯主義論調的文章。⁹⁷

《滿洲評論》的編輯中，大多數是滿鐵經濟調查會的調查員，該調查會是 1932 年 1 月應關東軍之要求，整編調查課成立的，因此《滿洲評論》與經濟調查會關係非常密切。新銳調查員利用從工作場所得到的知識，能比較自由地剖析當時的經濟現象，或批判「滿洲國」的施政。⁹⁸《滿洲評論》每一期發行 5,000-8,000 部，在「滿洲國」內頗有影響力，⁹⁹如果該雜誌不存在的話，或許無法完全了解滿鐵調查部（調查課、經濟調查會）對當時社會的影響。

在新進調查員中，當時最受注目的是大上末廣，他同時也是《滿洲經濟年報》（1933 年創刊，滿鐵經濟調查會編）的編輯委員（另一位是天野元之助）。他生於 1903 年，畢業於京都大學經濟學部，1932 年到滿洲研究中國經濟，經由天野元之助介紹，而在同年 10 月進入滿鐵經濟調查會，同仁認為他在企劃文案能力、領導能力和馬克斯主義知識方面都非常出色。¹⁰⁰

⁹⁵ 山本秀夫，《橘樸》，頁 211。

⁹⁶ 野々村一雄，《回想 滿鐵調查部》（東京：勁草書房，1986），頁 170。

⁹⁷ 山本秀夫，《橘樸》，頁 213-214；野々村一雄，《回想 滿鐵調查部》，頁 171-172。

⁹⁸ 山本秀夫，《橘樸》，頁 214。

⁹⁹ 野々村一雄，《回想 滿鐵調查部》，頁 168、172。如果有一期刊登關東軍軍人的文章，則約印刷 2 萬部，大概是軍人購買。

¹⁰⁰ 野々村一雄，《回想 滿鐵調查部》，頁 45。

大上末廣的理論，屬於 1930 年代初期以來日本經濟學派論爭中的「講座派」。「講座派」於 1931 年 5 月到 1932 年 8 月之間，在日本出版了《日本資本主義發達史講座》，山田盛太郎則著有《日本資本主義分析》（1934 年），當時年輕知識分子深受「講座派」理論和山田著作的激盪。大上末廣浸淫於這流行的思潮中，極力促成《滿洲經濟年報》在 1933 年 9 月創刊，顯示出他把在日本國內論壇的想法和論爭，帶到經濟調查會內部，欲使滿鐵職員認識陌生的、馬克斯主義色彩濃厚的講座派經濟學，因此才有《滿洲經濟年報》的誕生。¹⁰¹

一直受到馬克斯思想影響的橘樸與大上末廣之間一拍即合，彷彿如魚得水。當時天野元之助是經濟調查會第一部第四班（滿洲經濟班）主任，曾經邀請橘樸到經濟調查會講授幾次中國社會經濟史，所以天野和大上等人以私淑弟子身分，尊稱橘樸為「老師」，大上也深受橘樸見解之影響。¹⁰²到 1934 年 2、3 月間，大上在經濟調查會中主持研究會，以橘樸為理論指導者，共同批判、研讀剛被翻譯成日文的魏復古(K. A. Wittfogel)之《支那之經濟與社會》。橘樸指出，魏復古在中國經濟史的分期中，把宋至清末視為商業資本的社會，是錯誤的看法。他在翌年發表〈王道概說〉，認為該時期是「半封建的商業資本社會」，這種說法一直影響大上及其他與會者。¹⁰³

至於大上所主持的《滿洲經濟年報》1933-1935 年版，實際上就是利用馬克斯主義的理論，來分析滿洲社會經濟的歷史結構及現實問題。他們把滿洲社會的近代化視為半封建的、半殖民地的資本主義化，此說法成為以後分析滿洲經濟的方法論。¹⁰⁴現今重新閱讀《滿洲經濟年報》，固然會覺得其理論過於粗糙，但不可否認的是，在當時以實證的田野調查手段配合理論，是一

¹⁰¹ 野々村一雄，《回想 滿鐵調査部》，頁 45-46；三輪武，〈經濟調査會から調査部まで〉，收入井村哲郎編，《滿鐵調査部——関係者の証言》（東京：アジア經濟研究所，1996），頁 450-452。

¹⁰² 山本秀夫，《橘樸》，頁 217-218。

¹⁰³ 山本秀夫，《橘樸》，頁 218-219。

¹⁰⁴ 野々村一雄，《回想 滿鐵調査部》，頁 47。

種嶄新的滿洲社會經濟研究方法。

再者，橘樸和大上末廣都認為發動九一八事變的關東軍是一種反資本家、反政黨導向的新勢力，關東軍是與當時日本中央當權資本家政黨的霸權相對立。所以他們企盼能夠巧妙地誘導此新勢力，改變現狀，實踐自己的理想——「王道」。¹⁰⁵橘樸心目中的「王道」，是保障人民生活的政治，其原本的模型是《禮記》中的「大同」社會，是一種人民自治的社會。所以他在 1931 年 12 月曾經提出「滿洲新國家建國大綱私案」，其內容與後來成立的「滿洲國」協和會有相同之處。¹⁰⁶他認為新國家應是分權的自治國家，具有行政自治體、經濟自治體和各民族社會自治體（綜合自治體）三部份，其中，他特別強調「農民自治」的基本組織，而此「農民自治」的組織原則就是「職業自治」。農村合作社則是保障「農民自治」不可欠缺之一環，其歷史傳統可上溯到北宋的鄉約運動。他認為鄉約運動是實踐「大眾的王道思想」，但到明中葉以後逐漸變質，地主、商人、高利貸成爲三位一體的鄉紳階層，榨取勤勞的農民。往昔與農民站在同一路線對抗官權的鄉紳階層，此時轉移到統治者階級，使鄉約運動變質，農村共同體爲之分裂、崩潰，亦即鄉約制度從原本的自治組織，變質爲官僚政治網末梢的輔助機關。因此他在 1930 年代提倡的農村合作社運動，是尊重農民所擁有的傳統「自助精神」，並非已因時勢激變而腐朽的方法。¹⁰⁷

¹⁰⁵ 浜口裕子，〈橘樸と石原莞爾——滿洲事變前後を中心に〉，頁 24-25；野々村一雄，《回想 滿鉄調査部》，頁 48。

¹⁰⁶ 浜口裕子，〈橘樸と石原莞爾——滿洲事變前後を中心に〉，頁 25。

¹⁰⁷ 山本秀夫，《橘樸》，頁 221-235。

四、亞細亞主義？¹⁰⁸

無論是學院派的白鳥庫吉，或非學院派的橘樸，都對中國東北地區的歷史發生興趣，不同的是，白鳥的研究對象是歷史上居住在那裡的民族，而橘樸所關心的是二十世紀初期的當地農民。兩人都隨著日本侵略亞洲的步伐，先觀察中國（包括東北）的歷史與現狀，再將觸角延伸到亞洲，最後回顧到日本本身。

（一）辛亥革命與白鳥的國體論

當辛亥革命爆發後不久，白鳥於 1911 年 12 月在《中央公論》上發表了〈論支那歷代之人種問題及這次大革命之真正原因〉一文，指出辛亥革命的最大原因是人種問題，即漢族與滿族的軋轢，這並非一時的現象，而是四千年來漢族與塞外民族相爭史的產物。由於漢族的同化性很強，所以即使在歷史上曾被征服，也能以其文化風俗來同化異族，因此這次革命可謂為團結中國各民族以建立鞏固國家的第一步。他甚至確信如果沒有列強的壓迫，中國應該能夠開始形成可以立足於列強之間的近世國家。¹⁰⁹在此，他忽視了日本也是當時侵略中國的列強之一。

隨著辛亥革命以後中國政情的變化，白鳥逐漸認識到辛亥革命在中國歷史上所象徵的意義。他於 1913 年所寫的〈支那之國體與中華民國之現狀〉一文的開頭，即明言清朝崩潰以後，往昔的君主政體轉變為民主政體，這是中國史上空前的大變動，同時也是東洋世界未曾見過的大變動。¹¹⁰接著，他把

¹⁰⁸ 關於亞細亞主義或大亞細亞主義，前輩學者的著作汗牛充棟，也沒有一致的基準。狹間直樹教授指出，前者是以日本與亞洲各國屬於對等關係為前提，而後者的前提是日本的優越性，本文從此說。見狹間直樹，〈アジア主義とはなにか〉，《東亞》，號 410（2001 年 8 月），頁 72-76。

¹⁰⁹ 白鳥庫吉，〈支那歴代の人種問題を論じて今回の大革命の真因に及ぶ〉，《白鳥庫吉全集》，卷 10，頁 131-145；五井直弘，〈近代日本と東洋史学〉，頁 63-64。

¹¹⁰ 白鳥庫吉，〈支那の國體と中華民國の現狀〉，《白鳥庫吉全集》，卷 10，頁 161。

中國政體改變的因素歸諸儒教，他認為儒教中的皇帝是天的代理人，故天子應該是萬民之中的有德者，受天命而君臨萬國。一旦無德，則喪失做為天子的資格，其他有德之人物可起而代之。中國此種君主的更替就是革命，這就是儒教的國體論，因此中國的君主政治實質上是一種神裁政治。而堯舜禪讓傳說是中國儒教的理想，在中國人的理想中，更換君主是理所當然的現象，世襲的王朝反而是不正常的體制，不被中國人所喜好。¹¹¹

再者，白鳥的這種想法源自《書經》，他明確地指出《書經》是儒教的經典，《書經》的精神是民主主義或平民主義，亦即君主之政如果合乎民意，則為仁政，君主施行仁政時，民服從其君；反之，民不服從君主的虐政時，則有其他仁君代之。中國所謂的禪讓放伐，即為革命。而君主之位由天所賜與，天命即經由民意來表達，此為中國式民主主義的特色，是相異於西洋的民權思想。¹¹²但他認為，中國式的民主主義與歐洲民主政治的形式類似，例如，美國或法國等共和政體所施行的總統選舉，即代表民心之依歸，能博得眾望者會被選為總統。所以模仿西方共和政體的中華民國出現並不足為怪。¹¹³

另一方面，白鳥也指出，中國儒教的國體雖在形式上類似西方的民主主義，其理論精神卻不同，亦即儒教的國體論是國本主義，中國的君主政體中，主權在君不在民，君主統治權的本源來自天，絕非民；而西方民主主義則強調主權在民。中國人所以能模仿美國的共和政治，是因為其形式類似於傳統儒教的禪讓主義。所以大多數的中國人以為，中華民國成立後，就可以回到堯舜時代那樣的輕徭薄役，這是一大誤解，因為此後一切建設都非依靠財稅收入不可。但即使革命者能夠了解此點，一般人仍然夢想著古代的儒教主義。因此袁世凱即使到處向列強借款，也不能直接對人民增加稅負，否則會被視

¹¹¹ 白鳥庫吉，〈支那の國體と中華民國の現状〉，頁 162-164。

¹¹² 白鳥庫吉，〈儒教の源流〉，《白鳥庫吉全集》，卷 9，頁 53-55。又，此文發表於 1912 年 9 月的《東亞之光》，卷 7 號 9。

¹¹³ 白鳥庫吉，〈支那の國體と中華民國の現状〉，頁 165。

為暴政。¹¹⁴

白鳥的這種國體論表面上是針對辛亥革命而發表的，實質上則蘊含著對日本「萬世一系」國體的絕對支持。因為他堅信，儒教影響日本君臣關係和忠孝道德觀的形成，¹¹⁵而日本皇室的地位高於中國的皇帝，應與天相等，所以日本與中國的國體不同，中國的天命既然是永久的，故無論日本的幕府將軍如何更迭，皇室亦應萬世一系。因此即使儒教思想中存在有革命思想，亦不足為懼，日本國體將永續不變。¹¹⁶可見對他而言，天皇制具有不可挑戰性。

由於白鳥的關懷是日本皇室所代表的日本君主政體，因此對辛亥革命非常注意，因為畢竟是儒教母國所發生動搖國本的事件。他所關心的對象是統治階層，雖然文中使用庶民或人民的語彙，但只是意味著被統治者的意思，並非民眾。因為他對十九世紀末的義和團事件和 1919 年的五四運動都絲毫不加以評論，可顯示出他根本不關心中國本身的變革，所以他所倡導的白鳥史學也忽視了民眾世界的存在。

再者，白鳥對於中國人的國家觀也抱持懷疑的態度，在〈儒教之源流〉一文中，他論述到傳統中國所謂的九州並非實際上的地理區域劃分，而「九」與陰陽思想有關：包含陰陽思想的《書經》和純道德教、只講究仁的孔子思想相異，此陰陽思想在戰國時代盛行，故講究仁和義的孟子思想也受陰陽思想的影響。相對之下，儒教的政治思想講求天命，是一種普世價值的主張 (universalism)，不合於戰亂的追求國家主義(nationalism)之時勢。漢武帝採用儒教，企求政治與精神上的統一。此後兩千年的中國政府大都以儒家政治為其理想。但是儒教主義認為中國就是天下（即整個世界），到十九世紀中葉以來開始和歐美各國交涉，才認識到中國以外還有優秀的文明，於是列國競爭的時代再度來臨，因此以儒教的天下主義已無法立國，非得像戰國時代那

¹¹⁴ 白鳥庫吉，〈支那の國體と中華民國の現状〉，頁 167-169。

¹¹⁵ 白鳥庫吉，〈古來我が國に渡來せる外國文化の性質〉，《白鳥庫吉全集》，卷 9，頁 37-52。

¹¹⁶ 白鳥庫吉，〈支那の國體と中華民國の現状〉，頁 163-164；白鳥庫吉，〈日本における儒教の順應性〉，《白鳥庫吉全集》，卷 10，頁 238-240、246-248。

樣，採取國家主義不可，辛亥革命就是出現於這種氣氛之下。結果雖然推翻滿清政府建立共和政治，但是大多數的中國人並沒有體認到國家主義的必然性；並且儒教只是要求列國停止競爭、廢除戰爭、減輕人民稅負的反抗思想而已，在春秋戰國時代已無法實行，何況如今？所以依賴此空想的中國難免在列國競爭中失敗，因此爲了因應今日之時勢，必須實行國家主義，擁有鞏固的中央集權政治。¹¹⁷換言之，他從批判《書經》開始，論及辛亥革命當時的政治環境，顯示出他把中國視爲儒教立國的中國觀。

由於儒教視天下爲公，所以白鳥在〈支那之國體與中華民國之現狀〉一文中，強調儒教主義的世界觀不能產生所謂的國家觀念，因爲國家觀念是當大家意識到自己的國家之外，還有其他國家存在時才能萌生。而中國之天子自視爲世界之君主，又把天下看成是一家，中國人又非常自私，故中國無法出現國家觀念。唯有當中國人覺察到國家利益與自己的利益相符合，國家若被滅亡，則自己亦無法生存時，才肯心甘情願地爲公共事務而多納稅，才肯犧牲自己去爲國家盡力。¹¹⁸在他的想法中，中國人在長達兩千年的歷史中，被培養成天下主義，所以唯有受到來自外部的壓力時，才能覺醒而意識到穩定的國家和中央政府的必要性。

（二）國民革命與橘樸的革命論

白鳥庫吉的「中國人沒有國家觀念」之說法，成爲戰前日本主流的中國觀之一。針對此點，十多年後橘樸在1927年發表〈中國人之利己心與國家觀念〉一文，批判這種觀點，他認爲中國人雖然大多是利己主義者，但從理論上無法推衍出他們未能形成國家。首先，他以佛教在中國的傳播爲例，指出由於中國人既自私又好面子，故如果新主義或思想既可增進中國人的物質或精神的生活利益，又能維持他們的面子時，就可以被中國人所接受。其次，他認爲孫文所提倡的民族主義是把近代的國家思想具體地介紹給中國人，以

¹¹⁷ 白鳥庫吉，〈儒教の源流〉，頁53-69。

¹¹⁸ 白鳥庫吉，〈支那の國體と中華民國の現狀〉，頁170-171。

企圖建立民族國家，國民黨在廣東農村所組成的農民協會，能增加貧農的利益，使他們感謝其組織者，從而擁護國民黨和國民政府。換言之，當目不識丁的農民體驗到自身的利益必須依賴國家時，他們會不辭物質或精神上的犧牲，而積極擁護國家，如此，農民的利己心不知不覺之間就與愛國心一致。¹¹⁹

再者，他進一步指出，五四運動即學生的愛國運動，學生未必經由利己心或實物教育的媒介，他們只是因為列強的壓迫而凝視祖國的命運後，自發性地奮鬥，但不可忽視的是陳獨秀、胡適等先覺者的刺戟。另一方面，如果中國人的血液中沒有流著民族愛的情緒，則先覺者的刺戟也不會出現深厚的效果。民族愛是一種本能，爲了要把他們所燃燒的民族愛發達到愛國心，就必須建設值得他們深愛的新國家。他認爲當時的國民黨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1924 和 1926 年）中所提出新國家建設的理想，就是因此受到學生由衷地支持。¹²⁰如此，他經由實地採訪觀察的結果，認爲中國人具有國家思想，此點與坐在象牙塔中從事案牘研究的白鳥庫吉之看法，自然大異其趣。

進而言之，相對於白鳥庫吉的忽視民眾世界的存在，橘樸則將關懷重點置於中國社會革命。他認爲四千年的中國歷史經過三次社會革命，第一次是春秋戰國時代（西元前 770 年周朝東遷，到前 246 年秦始皇即位）的五二五年間，此時期是第一期亂世。第二次社會革命是五代十國（780 年唐德宗即位到 960 年宋太祖即位）的一八一年間，此可稱爲第三期亂世。第一次和第二次社會革命之間則有第二期亂世（六朝時代，184 年黃巾賊之亂到 581 年隋文帝即位），但沒有發生社會革命。而第三次社會革命（第四期亂世）則以太平天國(1850-1864)爲始，此後的各種革命運動（包括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和軍閥混戰，都是中國史上第三次社會革命的過程。¹²¹可以看出他的社

¹¹⁹ 橘樸，〈支那人の利己心と國家觀念〉，《支那思想研究》，頁 287-308，此文原刊載於亞東印画協會，《支那研究論叢》，輯 1（大連：亞東印画協會，1927 年 4 月）。

¹²⁰ 橘樸，〈支那人の利己心と國家觀念〉，頁 309-331。

¹²¹ 山本秀夫，〈橘樸〉，頁 116-117。

會革命概念，並非易姓革命或政治革命，而是長期性的社會變革過程，也就是說，第二次社會革命的結果是成立完整的官僚階級和實行徹底的君主專制，而第三次社會革命是開始於中產階級對抗官僚階級的鬥爭，是一種以法國大革命為典型的資本家階級革命。¹²²

隨著革命運動的進展，他認為普羅階級（包括農民、勞工和小資產階級，是構成中國社會中被統治階級的中下層）也加入打倒官僚、軍閥的行列，結果所出現的資本主義社會組織型態，實質上與歐美乃至日本有顯著的差異，而此股聯合勢力成為將來建設民族國家的中心勢力。¹²³

在這種認知之下，他確信寧漢分裂時的國民黨左派是國民革命的正統推動者，但日後完成北伐、統一中國的卻是蔣介石。他將北伐的完成界定為資本家階級的勝利，此勝利是與帝國主義和軍閥妥協而達成的，所以他認為蔣介石指導下的國民黨趨於保守化，已脫離了孫文思想。即使如此，他依然反對中國共產黨急進的勞農運動，仍然視國民黨左派為國民革命之正統擔負者，而左派的最大弱點是欠缺大眾組織和軍事力量，所以橋樑把國民革命的未來寄託在蔣介石和左派的合作上。但事實的進展與他的願望相違，使他對國民革命徹底失望，因此在九一八事變以後，轉而支持石原莞爾和反日本資本家的關東軍，期盼使日本勤勞大眾能從資本家政黨的獨裁和榨取中解放，並同時建設中國東北地區成一獨立國家，以為解放亞洲的基石。¹²⁴

（三）橋樑的東洋社會創造論

橋樑於 1939 年因病返回日本，兼任東亞研究所的囑託，該所成立於 1938 年 9 月，是以近衛文麿¹²⁵為總裁的國策研究機構。大上末廣早自 1938 年 6 月

¹²² 橋樑，《中國革命史論》，頁 1-13。

¹²³ 橋樑，〈支那人氣質の階級別的考察〉，《支那思想研究》，頁 240-287；山本秀夫，《橋樑》，頁 122-126。

¹²⁴ 山田辰雄，〈橋樑と中国国民革命〉，頁 417-454。

¹²⁵ 近衛文麿(1891-1945)，京大畢業，曾任貴族院議員，1919 年陪同西園寺公望出席巴黎和會，1937 年 6 月第一次組閣。抗日戰爭爆發後，發表聲明，不與國民政府談判，1939 年內閣總辭，就任樞密院議長。1940 年 7 月第二次組閣，創設大政翼贊會，與德締結同盟，樹立國防國家

即參與研究所的籌設方案，大概是他介紹橘樸到該所。當時日本國內橫溢著近衛所聲明的〈東亞新秩序建設論〉，橘樸則於 1941 年 3 月發表〈東洋社會之創造〉一文，認為東洋包括自圖們江至波斯灣口一線以南的大陸和島嶼，他所設定的目標是解放住在這廣大農村社會的諸民族，創造嶄新的東洋社會，以對等的關係與西洋社會雁行，共同建設和平且光輝的世界社會。而在創造東洋社會的政治過程中，日本民族為了能成為領導者，必須改造其民族性。他進一步闡明，日本民族的缺點是島國性格，而要克服島國性，有兩個方向，第一個方向是利用批判性的科學精神，攻擊一切舊有的習慣；第二個方向是善用當時的中日戰爭。因為他認為在中日戰爭的過程中，中日兩國人民經由直接接觸而增進彼此了解，消滅了甲午戰爭以來，日本人對中國民族所抱持的偏見，而此偏見是由於島國性格中的偏狹和獨善等要素所形成的，因此，如果偏見消失了，則島國性格也會顯著地褪色。¹²⁶

再者，他同時指出在中日戰爭的過程中，日本的產業和社會必然重組，工業部門會變成以重化學工業為中心，而農業部門也會發展為機械化、大規模的共同經營方式。另一方面，東洋社會基本型態的家族組織，可擴大到宗族、民族組織，是一種團體主義，亦即存在著個人對團體的奉獻關係，所以一定能適應大規模的共同經營模式。¹²⁷

橘樸一向批判將東洋等同於封建農本主義的看法，所以他以「團體主義」的概念來說明東洋社會的特徵。此特徵在舊中國社會中，他認為是個人之人格首先奉獻給家族團體，其次是宗族團體，最後是村落團體，¹²⁸再擴而大之即為民族組織和國家。

體制。1941 年 7 月，為了打開日美交涉之道而更替外長松岡洋右，組織第三次內閣。旋即於 10 月因喪失與美國妥協的自信而辭職。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賦閒在野，1945 年 12 月被審判為戰犯，而於 16 日服毒自殺。見三省堂編修所編，《コンサイス人名辭典 日本編》，頁 463。

¹²⁶ 山本秀夫，《橘樸》，頁 317-320。再者，大上於 1939 年 11 月就任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助教授。

¹²⁷ 山本秀夫，《橘樸》，頁 320-321。

¹²⁸ 橘樸，〈通俗道教と民族道德との關係〉，《支那思想研究》，頁 92-117。

事實上，他這種日本領導東洋社會的想法早在 1930 年代初期即已出現。他於 1933 年 7 月到 12 月之間，以〈汎亞細亞運動之新理論〉為題，先後在《滿洲評論》上發表九篇論文，不但批判當時日本「大亞細亞」派的主張以少數知識分子和軍部來施行改造運動，¹²⁹而且提出自己的想法。他的「汎亞細亞論」是站在東洋民族和農民社會的立場，企求能脫離西洋民族和工業社會的羈絆而獨立。他認為在印度、中國、滿洲等農業國家，要形成以農民民主為基礎的社會主義社會，而在日本和印度、中國的工業地帶，就要形成以職業性民主為基礎的社會主義社會。這些社會先以民族為單位，結合成亞細亞聯盟，再進一步創造出質方面的共產社會（並非共產主義社會）和量方面的世界社會。他指出「亞細亞聯合」的紐帶是民族、職業和地域三要素，要毫無矛盾地貫通此三要素而組織成「亞細亞聯合」的唯一方法是建立「職業自治國家」，亦即自鄉村、經由國家，到國家聯合的擴大地域階段中，必須要組織法定職業團體個別性與綜合性的自治機關。¹³⁰

那麼，日本和此「亞細亞聯合」的關係如何呢？由於他認為日本既然是亞洲的先進國，就應該負責指導汎亞細亞運動。由於「亞細亞聯合」的指導原則「既非資本主義，亦非國家主義，而應是國際主義」，所以必須改造當時的資本主義國家——日本，使之成為「職業自治國家」。其改造的原動力是所有的勤勞國民，其中他特別重視軍方、農民和勞工，由這三者組成「大眾的、革命的獨裁政黨」，來領導日本的社會改造。¹³¹換言之，因為日本軍隊的成員中大部份是農民和勞工，故一直重視農民與勞工在社會改造運動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橘樸，當然認為軍方是擔負社會改造的主力。

再者，站在國際主義立場的橘樸，雖然在理論上否定優秀民族的指導權，

¹²⁹ 有關他對大亞細亞派的批判要點，詳見山本秀夫，《橘樸》，頁 236-238。

¹³⁰ 山本秀夫，《橘樸》，頁 239-240；浜口裕子，〈橘樸と石原莞爾——滿洲事變前後を中心に〉，頁 28；小股憲明，〈橘樸の社会思想と変革論〉，頁 24-25。

¹³¹ 浜口裕子，〈橘樸と石原莞爾——滿洲事變前後を中心に〉，頁 28-29；小股憲明，〈橘樸の社会思想と変革論〉，頁 25-26。

但是他也承認優秀民族在現實世界中的指導權。例如，日本帝國就存在著「優勢的」大和民族和「劣勢的」朝鮮、台灣民族相對立的問題，因此他主張在改造日本的過程中，必須解決此種不幸的、被壓迫的弱小民族問題。¹³²他所提出的解決方案是，維持日、台、朝各民族結合成一國家的現狀，但由於此現狀是資本家階級強制性的機械性結合，所以被壓迫者要對榨取者進行共同的鬥爭以改變此狀態，從而建設各民族自治的結合狀態。¹³³他堅信日本民族在其所統治的領域內，如果沒有給與朝鮮和台灣自治權，則亞洲各民族絕對不會信任日本，因為亞洲各民族視當時之日本是和英美法等國為全然同質的帝國主義國家。¹³⁴所以唯有改造日本本身才能改變現狀，解放亞洲被壓迫的諸民族，發展成「亞細亞聯合」。

雖然橘樸所醉心的社會是既非資本主義又非共產主義，而是以職業民主為基礎的烏托邦式無政府共產社會，他企求把東亞建設成沒有民族衝突和階級對立的社會。但是，對日本帝國內的各民族，他僅只創設了自治權，並未提出讓台灣、朝鮮獨立的主張。就此意義而言，他徘徊於原則上的民族平等和現實世界中的日本指導權之間，雖然他的「亞細亞聯合」和「東洋社會」都是意欲以亞洲先進日本的力量，來從歐美列強的帝國主義侵略中，解放亞洲各民族，但結果卻難免為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中國、乃至亞洲，做了合理化的詮釋。

五、結 論

日本在明治維新以後，隨著西方文化的引進，使原本「漢學」傳統的歷史研究遭遇到空前的挑戰與變革。而甲午戰爭以降的一連串國際外交事件，

¹³² 橘樸，〈日本改造の過程（上）——汎亞細亞運動の新理論の7——〉，《滿洲評論》，卷5號15（1933年10月），頁12。

¹³³ 橘樸，〈日本改造の過程（下）〉，《滿洲評論》，卷5號24（1933年12月），頁18。

¹³⁴ 橘樸，〈日本改造の過程（下）〉，頁19。

使當時的學院派學者得有機會蒐集中國「正史」以外的史料，以及朝鮮史和滿洲史的基礎史料，或許可以說他們抱持「文化的民族主義」情懷，以特別的使命感來企盼確立日本的東洋史學。¹³⁵其中，白鳥庫吉以地理位置最接近日本的朝鮮古代史研究為始，再擴大範圍到蒙古史、中亞古代史和滿洲史的領域，他以歐洲的東洋學為典範，努力於蒐集資料和建立研究體制，以期建構超越西歐的日本東洋史學。而在辛亥革命發生以後，他反思到日本的歷史與文化，從史料中尋找天皇制的合理性和穩定性，更進一步肯定了日本帝國主義對東亞的侵略。

相形之下，新聞記者出身的橘樸，在親身體驗滿洲和孫文的革命運動中，發現以中國為主的東亞民族特性——以團體意識為基礎的團體主義體制，即共同社會；他認為西洋社會是以自我意識為基礎的民主體制，即集合社會。但是十九世紀末葉以後，隨著資本主義的變質（移轉到帝國主義階段），西方的個人主義漸漸傾向集團主義，而東洋社會也產生自我意識，東西兩社會逐漸接近，擁有相當廣泛的共通處。然而由於兩社會的基礎仍然不變，所以西洋的集團主義和東洋的團體主義不同，東洋所萌芽的團體主義之自我意識，也相異於西洋的個人主義之自我意識。¹³⁶換言之，橘樸在研究東洋社會的特質時，將之置於與西洋相對照的立場。

進而言之，橘樸認為因為欠缺科學精神的東洋社會是立足於團體主義精神，所以重視協和，容易妥協；而科學精神的淵源是個人主義的發達，個人意識成為批判精神的母體。所以橘樸主張東洋社會應該吸收在西洋社會發展的自由主義和民主主義，以建構能夠培養批判精神的社會基礎。¹³⁷或許他希望日本、中國所擁有的東洋特殊性，能經由西方近代文明的媒介，而成為人類普遍的精神產物。

¹³⁵ 中見立夫，〈日本の東洋史学黎明期における史料への探求〉，頁 120-121。

¹³⁶ 山本秀夫，〈橘樸〉，頁 318；Stefan Tanaka, *Japan's Orient: Rendering Pasts into History*, pp. 220-221。

¹³⁷ 山本秀夫，〈橘樸〉，頁 318-319。

當橘樸回顧到日本時，相對於白鳥毫無保留地擁護天皇制，他提出著名的「國體論」，其理論核心是「階級超越」法則，亦即建設「一君萬民」的理想社會。橘樸認為天皇的地位是超越一切階級，是一種象徵，他統合民族的權威和階級的權力，天皇因民族大眾（勤勞階級）的意志而存在，排除了「君」和「民」之間的支配階級。¹³⁸這種想法似乎類似於他在著作中常常引用孟子的「王道論」和中國民族理想中的「大同社會」，也可視為他對日本未來發展的期待。

總之，日本東洋史學的萌芽與西方歷史學的傳入息息相關，而與其說其建構期適值日本帝國主義的擴張過程，毋寧可以說因日本帝國主義向東亞的侵略，誘使學院派和非學院派的歷史工作者投入於有關朝鮮、滿洲和中國的史料蒐集、田野調查和研究機關設置工作，並以實證主義的歷史學去分析史料，乃至建立理論，他們和當時的日本官僚、商人、帝國主義者一樣，都想了解中國，以及西方、日本和亞洲之間的互動關係。¹³⁹在本文所舉的白鳥庫吉和橘樸，都先後成為滿鐵的滿鮮歷史地理調查室（部）和調查課的囑託，前者側重於蒐集、編纂和出版資料集，後者則從事實際的田野調查工作。滿鐵調查部原本是日本對中國的帝國主義侵略和殖民地經營的產物，其調查研究成果固然有侷限性，但仍可視為戰前日本的亞洲（中國）研究之一里程碑；多達 1,000 名的調查員中，不少人以追求真理的科學精神，來「抵抗」當時的軍部和中央政府，¹⁴⁰戰後有些人繼續從事東洋史學和經濟學領域的學術工作，¹⁴¹形成戰後一時影響日本學界的「滿鐵馬克斯主義」學派。

¹³⁸ 山本秀夫，《橘樸》，頁 321-325；小股憲明，〈橘樸の社会思想と変革論〉，頁 36-41。

¹³⁹ Stefan Tanaka, *Japan's Orient: Rendering Pasts into History*, pp. 190-191, 228-229.

¹⁴⁰ 野々村一雄，《回想 滿鐵調查部》，頁 413-414。又，在 1941 年的調查部，有 2,039 名工作人員，其中從事事務者大約有一半。

¹⁴¹ 例如，天野元之助進入京都大學研究中國農業史，野間清到愛知大學研究中國社會經濟史，野々村一雄研究蘇聯，川崎已三郎的恐慌論和貝島兼三郎的貨幣論研究等。詳見小林英夫，〈滿鐵調查部と戦後日本〉，《環》，號 10(summer 2002)，頁 374-376。

徵引書目

一、史料

- 白鳥庫吉，《白鳥庫吉全集》，卷2。東京：岩波書店，1970。
- 白鳥庫吉，《白鳥庫吉全集》，卷3。東京：岩波書店，1970。
- 白鳥庫吉，《白鳥庫吉全集》，卷8。東京：岩波書店，1970。
- 白鳥庫吉，《白鳥庫吉全集》，卷9。東京：岩波書店，1971。
- 白鳥庫吉，《白鳥庫吉全集》，卷10。東京：岩波書店，1971。
- 橘樸，〈支那批判の新基調〉，《讀書會雜誌》。滿鐵，1926年11月。
- 橘樸，〈日本改造の過程（上）——汎亞細亞運動の新理論の7——〉，《滿洲評論》，卷5號15，1933年10月。
- 橘樸，〈日本改造の過程（下）〉，《滿洲評論》，卷5號24，1933年12月。
- 橘樸，《中國革命史論》。東京：日本評論社，1950。
- 橘樸，《支那社會研究》。東京：日本評論社，1936年初版，1939年4版。
- 橘樸，《支那思想研究》。東京：日本評論社，1936。

二、專書

-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事日誌》，冊2（清季）。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3。
- 小林英夫，《近代日本と滿鐵》。東京：吉川弘文館，2000。
- 山本秀夫，《橘樸》。東京：中央公論社，1977。
- 山本秀夫編，《橘樸と中国》。東京：勁草書房，1990。
- 山本秀夫編，《甦る橘樸》。東京：龍溪書舍，1981。
- 井村哲郎編，《滿鐵調査部——関係者の証言》。東京：アジア經濟研究所，1996。

- 五井直弘，《近代日本と東洋史学》。東京：青木書店，1976。
- 中野実，《東京大学物語》。東京：吉川弘文館，1999。
- 内藤湖南研究会編，《内藤湖南の世界——アジア再生の思想》。名古屋：河合文化教育研究所，2001。
- 矢野仁一，《近代支那論》。京都：弘文堂書房，1923年初版，1924年再版。
- 林泰輔，《支那上代之研究》。東京：光風館，1927。
- 野々村一雄，《回想 満鉄調査部》。東京：勁草書房，1986。
- 野村浩一，《近代日本の中国認識》。東京：研文出版，1981。
- 礪波護、藤井讓治編，《京大東洋学の百年》。京都：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2002。
- Tanaka, Stefan. *Japan's Orient: Rendering Pasts into Hist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 van der Velde, Paul, and Alex Makay, eds. *New Developments in Asian Studies*. Leiden and Amsterdam: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Asian Studies, 1998.

三、論文

- 高大鵬，〈漢學回家時：全漢昇教授談日本「東洋文庫」〉，《中國時報》，1980年8月22日。
- 黃福慶，〈滿鐵調查部的調查事業——「滿洲舊慣調查報告」評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19，1990年6月。
- 小林英夫，〈滿鐵調査部と戦後日本〉，《環》，號10，summer 2002。
- 小股憲明，〈橘樸の社会思想と変革論〉，《人文學報》，號52，1982。
- 山田辰雄，〈橘樸の中国国民革命論〉，收入山本秀夫編，《橘樸と中国》。東京：勁草書房，1990。
- 山田辰雄，〈橘樸と中国国民革命〉，收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第三屆近百年中日關係研討會論文集》，冊上。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

中見立夫，〈日本の東洋史学黎明期における史料への探求〉，神田信夫先生古稀記念論集編纂委員会編，《清朝と東アジア》。東京：山川出版社，1992。

坂野良吉，〈中國政治をめぐる情報の質と政策決定の間——田中義一、蔣介石「會談」を例として〉，《戦前期中國實態調査資料の総合的研究》。東京：文部省研究成果報告書，1998。

花村芳樹，〈書評《中國革命史論》〉，《東洋文化》，號4，1950年7月。

狹間直樹，〈アジア主義とはなにか〉，《東亞》，號410，2001年8月。

浜口裕子，〈橘樸と石原莞爾——満洲事変前後を中心に〉，《軍事史学》，號94，1988年6月。

浜口裕子，〈橘樸と石原莞爾——「東洋民族解放論」と「東亞連盟論」〉，收入山本秀夫編，《橘樸と中国》。東京：勁草書房，1990。

四、工具書

三省堂編修所編，《コンサイス人名辭典 日本編》。東京：三省堂，1976。

下中邦彦編，《アジア歴史事典》，卷1。東京：平凡社，1959。

下中邦彦編，《アジア歴史事典》，卷7。東京：平凡社，1961。

下中邦彦編，《アジア歴史事典》，卷8。東京：平凡社，1961。

下中邦彦編，《アジア歴史事典》，卷9。東京：平凡社，1962。

Documentary Research and Field Work: Approaches to Oriental Historical Research in Japan

Tsu-yu Chen*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research methods used during the formation of the science of oriental history in Japan (*Toyoshigaku*). Shiratori Kurakichi and Tachibana Shiraki represented the two main schools in Japan's *Toyoshigaku* before World War II. We define these two schools as the "documents" school and the "field work" school. Japanese academic scholars, represented by Shiratori Kurakichi, began to inquire into the histories and cultures of Korea, Manchuria, and China during the period of Japanese expansion in Asia. On the other hand, Tachibana Shiraki, a journalist, came to China to observe social behavior under changing political circumstances and to study Asian history. Although they had different methodologies, views on Oriental society, and academic networks, both men paid attention to Japan's current situation and likely future. Moreover, they both had a relationship with the Research Bureau of the South Manchurian Railway Company. The publications of this Research Bureau, founded to assist Japanese aggression and colonial management, can be regarded as the basic sources of Japanese research into Asia prior to 1945.

Keywords: Japan, *Toyoshigaku*, Shiratori Kurakichi, Tachibana Shiraki, imperialism, South Manchurian Railway Company

*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